民國叢書

第五編

·80·



莫斯科印象記

胡愈之著

民國二十年八月二十日初版
民國廿一年十月十五日五版

（社會與教育社叢書之一）

莫斯科印象記

——實價八角——

著者　胡愈之

出版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街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頭　杭州延齡路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本書據新生命書店1932年版影印

序

日本的世界語者秋田雨雀先生於參加十月革命十週紀念遊俄歸來後寫了一本青年蘇維埃俄羅斯，在那書裏他說：

「知道蘇俄的將來的，便知道了全人類的將來。」

蘇維埃聯邦正在改造的途程中，牠的將來，還沒有人能知道。但是單就目前說，十月革命却已產生了許多奇蹟。而就我所見，最大的奇蹟是人性的發見。

在莫斯科使我最驚奇的，是我所遇見的許多成人，都是大孩子：天眞，友愛，活潑，勇敢。有些人曲解唯物主義，以爲蘇維埃的生活是冷酷的，機械的，反人性的。我的所見，恰

巧是相反。我在那裏是一個生客，但是住了一二天，就覺得個個人是可親的，坦白的，熱情的。

但是想起來這也並不足以驚異。因為蘇維埃革命，是以廢除掠奪制度，奴隸制度為目的的。掠奪制度一旦廢除以後，有手有腦的人，不必再為生活而憂慮；人不必依靠剝削別人或向人求乞而生存；這樣成人與孩子間的鴻溝自然是給填平了。

說布爾希維主義是「恨的宗教」的，分明是在說謊。試想國家，種族，階級，身分的成見除去了以後，再有什麼能阻礙人與人的相愛呢？自然階級鬥爭還在猛烈地繼續着。但愈是在勇猛的火線裏愈顯出人類大衆的同仇敵愾。Remarque 的西線無戰事，成為時下流行讀物，不就是因為他所描寫的戰壕中的 camaraderie 深深打動了讀者的心嗎？

奴隸打破了鎖鏈以後，奴隸便是大勇者。不然，對於蘇聯產業改造的超亞美利加

的速率，便無法解釋了。

要是我們的知覺還未完全麻痺了，當着這偉大的創造和這些誠實，勇敢，熱烈的創造者的面前我們是不免要面紅耳赤的。

爲了表示我的驚奇與媿怍，並爲了酬答莫斯科的朋友們的禮讓與善意，我纔寫了這一本小書。

本書的目的，也就不過如此。除此外，我勸告讀者，對於本書最好不要有什麼大奢望。

誠然，現在有許多人，頗想明瞭蘇聯的內情。但我這一本小書却不能給他們一個滿足。我只是偶然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個星期。除了首都以外，佔全世界陸地六分之一的蘇維埃聯邦，我都沒有到過。靠了這一點淺薄的經驗想明瞭蘇聯及其空前的革命事業的實蹟，那簡直是夢想了。（爲了使這些關心蘇聯內情的讀者不至過分地失望，

我願意把本年天津大公報所載的蘇聯特約通信介紹給他們；雖然這位通信員的觀點並不和我相同，但我敢相信在國內關於蘇聯的新出版物中，這是僅有而比較忠實的一種。）

要是有人想從我這書中，找出一些觀念，或者一些主義。他的失望一定是更大了。因爲觀念和主義是爲了別種目的用的，我並沒有爲了同樣的目的而寫這本書，這是很明白的事。也許竟有人截取了我的文字的片段，去迴護他自己的觀念主義，或攻擊別人的觀念主義，那麼，只好由他們去胡纏，我哪里理會得這許多。

本書的插圖一部分是我在莫斯科時攝取的。封面畫是用蘇聯的新派建築圖案作藍本，而經錢君匋先生改作，特附筆誌感。

著者　一九三一、七、二八於上海

目次

插圖目次

莫斯科印象記

跨進普羅之國

從巴黎開來的國際列車，通過波蘭境內最末一個車站後，便鳴着悠長的汽笛，放低了速度開行。不上一回兒，已到了蘇聯邊境。這樣地旅客便從白色的法西斯國家，跨進了赤色的蘇維埃國家，可是並不會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從車窗向外探望，只見路軌的兩旁，有兩列的紅軍放着步哨。這些哨兵都披着黃色皮大氅，臂上和帽上綴着紅星章，槍上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個個全是雄糾糾，頂瓜瓜。他們，他們原來是世界第一個無產國家的前線的守衛卒，他們要防禦全世界的布爾喬國家的襲擊，自然格外要耀武揚威；纔見得普羅國家是不可輕侮的。

進了俄國邊境，車便在奈戈萊羅亞（Negoreloe）車站停下。旅客照例在這裏檢驗護照行李隨後換車開往莫斯科。從西歐第一次到俄國的旅客，對於入境檢查都不免有戒心。但就我個人的經驗，入俄境的檢查並不比法德英比等國的入境檢查更麻煩。俄國的檢查員，對旅客很和氣，不像別國稅關吏那樣的扳起面孔。下車的中國人，除我以外，有兩個青田小商人，我們的行李只約略看了一看，並不留難。只有我們旁邊一個日本人，像大學教授的模樣，帶的箱籠很多，却一件件地細細檢查過。連隨帶的德文畫報和日記冊都一頁一頁地翻閱過。稅關內部的佈置，和別國稅關並沒什麼差異，所不同的就是壁上滿貼着赤色的標語，此外還有赤色救濟會的招待所。在車站上最覺得可異的，是站上辦事人員的從容不迫的態度。站內的搬運夫替客人提行李，老是慢吞吞地走着，客人催促着，他也不理會。檢查員也是如此。絕不像在別國車站所見的那樣匆忙緊張。有人說這是斯拉夫民族的習性，所以如果你只到了俄國的車站，你便不

能相信，他們是在厲行五年的工業化計劃，是在用着所謂「布爾希維的速度」追趕美國的生產階段呢。

兩個「老鄉」

午後七點半，旅客都上了車。這車是直達滿州里的。三等車的設備很不壞，四個人佔一小間，每人各佔一舖位，比頭等車相差，只是沒有軟椅墊。每一輛車內都有冷熱自來水管。有一間是茶房住的。茶房的一小間內，便懸掛着五年計劃的圖表，五年內全國造幾條鐵道，運貨和乘客的數目逐年增加多少，全列在表上。據說車上的茶房都必須把這些圖表數目字記熟。

車到了敏斯克(Minsk)上來了兩個「老鄉」(僑歐華工稱同國人叫「老鄉」)閑

着沒有事，便找他們談天。一個「老鄉」是浙江青田人在敏斯克工廠作工，一個是山東人，佩着一枚絢爛的紅軍勳章，他是在俄國內戰時加入紅軍去上陣，而且立過軍功的。我爲好奇心所驅，便和這位紅軍的「老鄉」交換了以下的談話：

「你老在俄國住的很久了罷。」

「不久，也不過十多年。」

「初來俄國時幹什麼？」

「來做工的。後來就幫他們打仗。」

「現在幹什麼？」

「還不照舊是趕伙兒。」

「生活不壞罷。」

「過得去就是。在這裏混着不會有什麼出息。不像你老做的發財生意。」

『笑話了。我是當學生的，還拿了家裏的錢來花，不像你們是能勞動的。你們現在每月能賺的多少？』

『馬馬虎虎。我資格老些，每月關餉，是二百塊俄洋，他（指青田人）是一百多塊。』

『二百塊俄洋，照這裏的兌換價，就合上中國洋四百元，不算壞了。』

『那還不是一手來，一手去嗎？在這裏花費太多，不會發財的。』

『你們都有了家室嗎？』

『都有了俄國女人，但那裏能算得家室，玩一玩就是了。』

『有多少華工在這裏？』

『不大清楚，大概總有二三千人。你到莫斯科時可以看到。』

『你對於這裏的情形，很滿意嗎？』

『別的倒也沒什麼。就是不能寄錢回老家。俄國洋是不許帶出去的。卽使私帶了

出去，到哈爾濱，俄國洋便換不到錢。」

「你不是已成了蘇維埃的人民嗎？還要寄錢回國幹什麼？」

「中國人總是中國人。」

接着他們兩人便交談着，談的話是一種「切頭，」大約是關於一種秘密買賣的，我不大懂得他們似乎不願意和我長談，所以我就停止談話了。後來我知道在俄的華工，生活都不壞，只是個個都不滿意，就因爲無法寄錢回家去。凡是到國外的，都知道中國工人永不會忘却「老家，」攢下了錢總要往國內寄。甚至在國外住下了幾十年，娶了洋太太，生了孩子，他們仍不會丟棄「老家，」所謂「樹高千丈，葉落歸根。」衣錦歸故鄉，是中國人的生活目的。所以歐洲人到美國做工去，便成了美國人，到非洲經商去，便成了非洲人，和本國再不會有什麼關係。中國人却不然，到南洋美洲去殖民的，住在外國已隔着幾代，仍然要把在國外辛苦儲積的錢，整千整萬地向國內寄去。有些人要

以爲這是中國民族的特長。但中國人到處被人憎厭，也正因爲拘守着這農業社會所遺留的鄉土觀念家庭觀念牢不可破的緣故。甚至在無產者的國家裏，種族的與國別的歧視已經是完全消滅了，（這一點在俄國可以完全相信。俄國人不但不歧視有色人種，而且看得比自國人更親切，因爲他們是同情於弱小民族的。）中國工人却依舊頑固地保守着他們的觀念形態。他們雖然已成了解放的無產階級中的一員，却仍保持着數千年來農業家族社會的原始頭腦，革命與階級鬭爭，他們全然不會了解。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莫斯科車站

清早醒來，車已快到莫斯科了。鐵路兩旁漸漸看見許多建築房屋的木架。到了莫

斯科近郊，在建築中的房屋愈多，有的是在建造工廠，有的是蓋着工人住所。大概是五年計畫的建築設計的一部分罷。除了這些已落成未落成的新建築以外，到處便只是一片冰雪。我來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莫斯科乃至俄羅斯的北部整個埋葬在白雪底下。早晨的微弱的陽光，從雪地上面反射，閃耀着眼目，風景却是夢想不到的美麗。

在我將從巴黎出發以前，很早我就想了種種方法，請求駐在巴黎的蘇聯總領事，准許我在莫斯科，停留一星期。巴黎領事署說是作不得主，便替我拍電去問莫斯科政府，可是莫斯科的復電只准許通過，却不許停留。所以我只辦了個過境護照，在莫斯科下車停頓是早已絕了望的。不過從俄國西境到西伯利亞的通車，照例要在莫斯科停車八小時。我想利用這非常寶貴的八小時，看看赤都的大概情形，所以在出發以前，就寫了幾封信給莫斯科的世界語同志。在以前我並沒有和俄國的世界語同志通過信，這次我是從工人世界語的團體的年鑑中，隨便找出幾個地址，寄信去，告知我到莫斯

科的日期。果然，正如我的預期，車進了莫斯科站時，遠遠已看見兩個女同志手揮着小綠星旗在迎接着。一位是在中央郵局工作的R女同志，另一位是在她的同部練習工作的少女。下了車，進了車站，又有兩位，N與L同志（請讀者勿生誤會：對於蘇維埃人民如稱「先生」或「女士」，便是一種不能饒恕的侮辱，所以我在本文裏，只好依着他們的習慣稱爲「同志」或「女同志」，雖然俄文的Tovarisch世界語的Kamarado，譯作「同志」是很不確切的。）也在等候着。異國的世界語同志，初次見面時，照例是和見了家裏人一般的親切。中國人講着世界語來到蘇聯的更是不常有。所以他們見了我也就和我見了他們一樣的欣喜。R女同志便問我在莫斯科能住幾時，我說午後就要動身走。他們都說，在這裏只停七八個鐘頭是看不到什麽的，如要看看，至少也得住上十天五天。我就說了因護照辦不成，雖想停留而亦不能停留的原委。於是N同志與R女同志提議和我同去向莫斯科當局交涉，會得到停留的准許也未可知。我想不到還

有這樣的機會，自然是接受他們的提議了。

他們也不很熟悉請求停留的手續應該怎麽辦。於是先引導了我到車站內O.G.P.U.的辦公室裏去詢問。一聽到了O.G.P.U.這名稱，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這不是在西歐一般人所稱爲神出鬼沒狡詐殘酷的蘇俄政治警察機關嗎？可是一到了那裏，我便大爲失望。O.G.P.U.的辦公室，原來是空空的，中間只有一張破舊的長桌，桌上放着一架電話機，幾本破爛簿冊。桌旁坐着一個着黑色制服，腰紮手槍的人，正在低着頭寫字。我們進去後，那人就起立招呼。N同志代我說了原委，那人就打了幾個電話，隨後同我們說，應該到莫斯科市蘇維埃去交涉。於是我們便辭了出來。假使在西歐，有人知道我曾去過莫斯科的O.G.P.U.，他們不會相信我還能生還的！

奇景

出了車站，在車站門前的廣場上，我便看到了奇景。

因爲這時候正是冬日，一歲中最寒冷的季節。冬日的莫斯科眞有着生長在溫帶熱帶的人們所夢想不到的奇景哩！這是一片銀世界。大地整個的被白雪籠罩着。建築物和電杆木都披着縞素。飄揚在車站頂上的赤幟，交叉在廣場上的紅色標語帶，格外顯出些威風。微弱的太陽光照在雪地上，柳絮一般的雪花却在空中飛舞。這是可驚的美麗的景物，是風景畫家所不易找得的題材。據說莫斯科過了十一月後直到三月爲止，幾乎天天飛着雪花，但也天天見着太陽。生活在西歐的人，冬日被昏黑的霧氣包圍着，不易見到日光。生活在南部的人，又整年是烈日當空。在這裏的冬日，却有着和別處

全然不同的景色。

冷可是冷極了。溫度總是在零下二十到三十度。在街上是不能駐足的，因爲朔風吹來是刺刀樣的尖利。街上的人們都披着茸茸的皮大衣，除了面部以外，全用皮毛緊緊地裹着，脚上都着了膠皮的靴套。有了這些禦寒的工具，也還是冷到不可忍耐。可是空氣却很清冽，使人精神格外地振作。

R女同志和我說：這幾天莫斯科正在舉行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二十五週紀念。二十五年以前的今日，天氣也是和現在一般嚴寒，當時莫斯科罷工工人，和軍警對抗，在露天死守到二十四小時，全不退縮。革命的熱情，竟把寒冷冲散了。還有那年列寧去世，恰巧也在這最寒冷的時節。莫斯科幾十萬的民衆，都去向列寧的遺骸行最後的敬禮。因爲人太多，許多人要在露天站立十餘小時，方才能夠擠到列寧的身旁。R女同志是親自看到的。當時滿街站着的人，都已興奮到忘却寒冷了。

電車上的鬪爭

我們在廣塲上搭了電車，去莫斯科蘇維埃。莫斯科城內公共交通只有三種車輛。第一是汽車，價很貴而且車很少，不易雇得。第二是在雪地上拖着的馬車，因爲沒有車篷，坐着很冷，所以大多是載貨的，很少載人。第三種是電車，却是穩快低廉。票價是劃一的，在市內無論遠近，買一張十個銅子的票就行了。但因爲電車幾乎是市內公共交通的唯一工具，（聽說莫斯科當局今年已决定建造地底鐵道，以便市內交通。）所以乘坐的人却異乎尋常的擁擠。我們在上海坐電車，往往覺得太擠，但比起莫斯科的電車來，却要算是非常寬暢了。在每一個電車停車處，至少總有五六十人在等候上車。按照規則，電車只准在車尾上車，在車頭下車。但車內總是擠的水洩不通的，你一上了車，必

須拚命向前擠過去。擠到了車頭，你方能下車，否則車過了站，你還是不能下來。第一回坐電車，我全無經驗。上車時我請R女同志先上去：因爲照着西歐的習慣應如此的。但略略推讓了一下，後面的人已擠上去，車開動了，我們都不能上去。等到第二次車來時，才一齊擠上，L同志率領着向車頭進攻，眞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到了車頭，不久便到目的地，從人叢中擠下車來。

R女同志便笑着說：『你明白了罷。這便是我們這裏的生活。在這裏，生活就是繼續不斷的鬭爭。你坐着電車便可以看出我們的鬭爭的精神。無產者只有向前鬭爭，決不能向後退讓的。如不走向前，你便落伍了』

我們到了莫斯科蘇維埃，這是莫斯科的市政府，全市的地方行政事務，全在這裏辦。關於外人入境出境的護照簽字，在這裏另設着一個專部。蘇維埃的房屋很老舊，大概是從前官署改的。入口處有兩個衞兵，但對一切往來的人全不查問。我們在門口脫下了大衣存放着，就到了樓上辦公處。辦公處的佈置，和平常銀行的櫃台相似，分着幾個窗口，分別辦事。一切情形和我在英法的市政廳所見的差不多。只是櫃台內坐着辦公的女職員較多，態度和靄，少一些官場氣。在辦護照簽字的那一部分，我遇見了兩個中國工人，也在辦出境護照的交涉。

我的同伴，代我向辦事人問了一下，方知是應該向一位主任請求。於是，我們進了另一間屋子，去見那部分的主任。L同志等便向他說了許多話，表明來意。那人起初還不肯，後來伴我去的人，再三和他交涉。我全不懂他們的話，大約是說莫斯科世界語會要請我演講，所以非停留不可。後來那人把我的護照留下，我們便與辭而出。

出門時，R女同志很高興地向我說
『好了，好了，現在你已得到在莫斯科停留七天的准許了。』

D同志的家庭

出了莫斯科蘇維埃以後，我們便分了道路：R女同志去火車站，代我取回行李，並退回臥車票價。N同志陪伴着我，去會見蘇聯世界語同盟的總書記D同志，並商量食宿等事。

D同志是工程師出身，共產黨黨員，有一個時期，曾任過政府要職。現在是擔任莫斯科大學敎授，工業報主筆，V.O.K.S.（對外文化宣傳委員會）的委員。他又是個世界語運動的先輩，在歐戰以前，他已是一個著名的世界語學者。革命以後，世界語得爲

現政府所重視，有不少地方是倚靠了他的力量。目前他是全俄世界語運動的領導者。但因爲他和國際工人世界語會領袖（法人）個人意見衝突的緣故，致使蘇聯世界語運動與國際工人世界語運動中間發生了裂痕。到了最近，普羅的國際世界語組織，也和國際工人體育會一樣，分成了第三國際與非第三國際的兩派，這是很可惋惜的。

到了D同志的家，主人已在等候着。D同志的家庭就我在莫斯科所見，要算是最富裕的。房屋是一間臥房，一間客室和一個小廚房。客室裏的裝飾，算不得十分華麗，却是足夠舒適。有沙發椅，有無綫電收音機，有留聲機架，有名貴的油畫。木器全是上等的。雖然比之於西歐工人家庭，這樣的裝飾，不算是奢侈，但以後我在莫斯科看到過的幾個家庭，都沒有像這樣的闊綽。滿屋的書架，裝滿世界語的書籍。據D同志自說，各國世界語的出版物，不論新舊，凡是重要的，都在這裏了。原來這是費了二十餘年的時間搜集成的。D同志的夫人是一個嬌小美貌的少婦，裝束也頗入時。即使走到巴黎的交際

社會裏，也不會覺得奇怪。據她自說，從前也曾到過巴黎，所以能說得漂亮的法國話。這樣的女子，我在莫斯科，也只有見過這一個，此外我所見的少女（外國旅客不算）全是不加修飾的。後來R女同志附着我的耳說：『你看D同志的家庭是有些太像布爾喬了。』

和D同志談了許多話，大半是關於世界語的。他因知道我是從法國來，所以問了我許多關於國際工人世界語組織的事，並探聽我個人的意見。我也問他俄國政府對世界語的態度。據他說，俄國革命以後，政府對世界語是不大同情的。因為俄國革命領袖都是多年流亡在國外的，他們大多學會了二三種外國語，所以不感到世界語的需要。列甯夫人並且在"Pravda"報上撰文反對世界語，所以當時世界語運動的進行頗困難。後來經過了許多次論爭，到現在政府對於世界語只算是取中立態度，也不反對，也不提倡。各地的世界語會却可以自由活動，從事宣傳，政府不加干涉。但現在政府

發行的郵票明信片，却有許多是把世界語和俄文並列。又國家設立的無綫電播音台，每星期總有幾次用世界語播音。V. O. K. S、也刊布了許多世界語文件，以供國際宣傳。所以和現在各資本主義國比較，蘇聯政府還算是能幫助世界語運動的。

住宅荒

不久，他們便替我安排食宿等事。D同志說，在無產國家作客，和在別處情形是不同的。假如你到柏林，倫敦，或隨便那一個歐洲大都市去旅行，你可以隨便住旅館，上飯館，一切待遇和本國的旅客一樣。但在莫斯科就不然。外國人來蘇聯旅行的，要是勞動者所推的正式代表，在這裏是當作上賓相待，一切都非常便利。此外凡不是以勞動者代表的資格來俄國的，一概被看作布爾喬。布爾喬的旅客，在這裏是一樣的歡迎，不過

旅館和膳食的費用，格外定得貴些。這叫做「剝削剝削者。」『為了這樣，去年一年中，我們才從美國旅客身上，賺得了一百萬美金，這數目便已足夠購五千輛的排種汽車，這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也不無小補啊！』

但因為我是一個不尋常的客人，D同志答應特別替我設法找尋廉價的旅館。這不是一回容易的事。他接連打了十餘個電話，又託N同志和D夫人出去交涉，鬧了半天，直到黃昏，仍然找不到一間住房。各處的回答都是說客滿。原來在莫斯科找住所本不容易。莫斯科的人口在一九一四年還只有二百萬，到革命後驟然增加到三百萬。雖然最近幾年中，市內及郊外新建了不少的工人住宅，可是房屋的建造究沒有人口增加那樣快。而且革命後從前貧困無家的工人，現在都得到了相當寬適的住宅。因此房屋的需要驟增，雖然沒收了以前貴族皇室的邸第，分配給工人，也還是不夠。許多工人只能住在狹小的屋內，連地窖下面，都住了人家。在五年計劃未完成以前，莫斯科的住

宅，眞是一個大問題。至於外國旅客，本有許多國立的旅館，可以安插。但我到莫斯科那天，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在莫斯科開會，所有莫斯科的旅館，全被各地派來的數千名代表佔滿了。要臨時找一間房間，實在沒有辦法。D同志是一個有力者，雖然分頭替我設法，仍找不到一個旅館。我當初以爲護照的事弄妥了，就可安心住下，想不到找一個下宿處，還有這樣的困難。

新聞記者的食堂

D同志夫婦又邀了我去鄰近的公共食堂，先喫了一頓午飯。（其實已是午後三點多了。莫斯科一般的習慣，午飯總是在下午一時以後四時以前，許多人是做完一天的工方喫午餐。）據D同志說，莫斯科的居民每天赴公共食堂喫飯，已成了普遍的習

慣。在家中自己做飯的，已很少了。因爲自己做飯，一定比食堂價貴，而且男女都做工，很少時間能回家做飯。公共食堂大多是合作社經營的各種職業的人，都各有指定的公共食堂。各人可帶客人到他自己的公共食堂裏去，却不能隨便闖入一個食堂裏去喫飯。因爲各個食堂的菜大概是相差不多，但定價却互有貴賤。收入較豐的職業者，指定的食堂，是比平常工人食堂價貴。這大概是因每個經營食堂的合作社，向國營批發店購買糧食物品時，價目不一律。在俄國，物價是完全由政府操縱着的。我們去的食堂，是專爲報業及新聞記者而設。是收入較豐的職業者、所以價錢比以後我所到過的工人食堂都要貴的多。D同志夫婦代我叫了一菜湯，一肉餅，一俄國特產的魚卵，（據說是講究的食品，但非常腥臭，我不能下嚥。）一糖漬水菓，此外是黑麪包數片。他們兩人也照樣喫。D同志共付了四個半盧布。這價錢是比西歐貴多了。

這食堂的建築很不小，可容四五百人。但每張餐桌都坐滿了人，有的還沒有坐位，

在旁站着等候送菜的全是女傭。因爲這裏是知識分子的食堂，所以秩序格外整飭。壁上貼着許多標語，我隨手指一條問D同志是說什麼。他代我譯出，是說：『付小帳給送菜的女同志，那便是侮辱女同志。』可見在俄國小帳雖已革除了，一定還有些人願意拿一些小錢去巴結女同志。後來有一次我到車站去寄放行李，那行李房的工人，也向我索取幾個銅子的額外小費。資本主義社會所遺留的習慣，雖是極細微的，也不易根本破除呢。

艱難的過渡期

從公共食堂出來，D同志到大學校上課去了，D夫人伴着我回家，拿出了茶和水菓請我喫。一面再打電話去找尋寄宿的旅館。依着電話簿上所有的旅館全去問過。大

多數的回答是『沒有房間』有幾家的回答是說：『房間是有着一兩間，可是太髒了，斷不能給外賓住。』只有二三家說，現在是沒有，要到六七點鐘也許有空的屋子也未定。因此只好再坐着等候。

已快到了黃昏時分了。暮色籠罩着莫斯科全城。從壁上的無線電收音機，發送出清脆柔和的音樂，慰安着方才從工廠中出來的勞動的人們，洗去一日間的工作的疲憊。夜已到臨，人們準備着休息了，而各處旅館還是杳無消息。到莫斯科的第一天，我便感受無家可歸之苦，R女同志也回到D家來了。她冒着寒冷，各處奔走着，替我辦好了行李和車票的交涉。因我還未找得宿所，也代我焦急着，而且向我深深表示抱歉。她說：

『在莫斯科住宅的困難，是一切未到過這裏的人所想像不到的。要是你到外省去旅行，即使找不到舒適的旅館，同志們都願意讓出他們的家庭的一角給你住宿。可是在莫斯科却毫無辦法。莫斯科的工人們，各人只分得了一間屋子，大多數的家庭都

只有一隻床舖。所以雖然一般都是非常富於客情的莫斯科人——這個你以後可以看出來，——也無法把客人留在他們的家中。要是五年計劃成功後，你再來莫斯科時，我尋住屋大概不會再有這樣的困難。現在是只好請客人原諒了。』

幸而D同志從學校裏回來了。在旅館裏找房間已經絕望，他便問我願不願意暫住在公共宿舍內。在公共宿舍內是許多人同住在一個房間的，不像旅館裏一個人可以佔一個房子。他恐怕我不願意。其實我已倦怠極了，只要有只床可以過一宿就好，顧不得什麼。而且在公共宿舍內過的是團體生活，比在旅館關起房間門一個人獨住，更有意思，我自然樂意接受的。於是D同志又打電話問了二處的公共宿舍，都還有着空出的床舖。一處是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宿舍，一處是無產者旅行社的寄宿所。在他們看來，似乎中國學生宿舍更適宜些，因爲在那裏有着同國學生，可以做翻譯，許多事情都方便些。於是便由R女同志陪伴着去找尋中山大學的宿舍。

出門到了街上，白雪撲面，寒風刺骨，寒冷到忍受不住。R女同志怕我凍壞了，用牠的皮大衣裹着我，夜間莫斯科街上行人稀少。我們急匆匆的走着。不一回兒，已到了中山大學宿舍的門前。我以爲今天晚上可以安憩了。叩了幾下門，從門旁的小窗探出一個人頭，這是宿舍內的看門人，問我們來作什麽。R女同志用俄語說明了原委。那看門人便問有沒有中大的入學證，我們說並不是來作學生的，只是來求一宿，所以入學證是沒有。那人便說這裏只給學生住，却不能收留校外的人。R女同志再三和他交涉，說剛才電話中他已答應留下床舖了。那人說這是出於誤會的，爭論了許多時候，仍不肯收留。我們站在門外冷的發寒顫，要求讓我們進裏面休息數分鐘，也不答應。結果是R同志把那看門人駡了一頓，我們只好再踏着雪走到遠處的電車站，搭着電車去找尋另一個寄宿所。

在到電車站去的路上，我在雪地上滑跌了一交，R女同志忙扶我起來，手攙着我，

蹌蹌踉踉地走着。雪越下越大，寒帶的朔風，迎面吹來，肌膚僵痛。那天我從清早起來，沒有片刻休息，疲憊到萬分。直到這時深夜，還在莫斯科街上踽踽涼涼地走着，還不知道今夜在何處下宿。第一天到莫斯科，便喫了這樣的苦，要不是後來六天的生活，使我十二分滿意，我眞要後悔這一行的。但看着R女同志在旁邊一同走，却又不免感愧交加。她爲了我整整奔走了一天，而且獨自去火車站替我辦了半天交涉。到此刻不但毫無倦容，而且一路撫慰着我，像母親撫慰小兒一般。在電車裏，她溫和地說：『你在巴黎、柏林那樣的大城市安逸慣了，到了這裏，一時會感到不舒服罷。其實現在的莫斯科，物質的困難，可以說大半解決了，只有住宅恐慌，使你受了些苦。要是你在十年前，內戰飢寒的時期，來到莫斯科，那時你才會遇到難以想像的困苦呢。社會主義現在是正在誕育中。一個小孩產生，都要經過分娩的痛苦，產生一個人類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新社會、新秩序，怎麼能不感到困難呢？但是我們蘇聯的人民却甘心忍受着這些困難。因爲我

們所得到的精神的快樂，足以抵償物質的困難而有餘。』

R女同志的話是有理的，就以後我在莫斯科所得的經驗。

寢室內的歡迎會

到了福金街（Fokin Strato）二號，扣門進去，於是我得救了。

在大雪中奔走了三點鐘驟然進了溫暖的室內，雖然只是簡單的工人的住所，在我已如進了皇宮一般。尤其是第一次見着我時，宿舍內人們的和靄的笑容，使我從內心裏感到無量的溫煦和愉快。

宿舍的辦事員，引導着我進了寢室。滿屋子的人大多已睡在床上了。R女同志替我介紹了一下。這宿舍的旅客多是從鄉間來的，很少見過中國人。聞知我從上海來，都

非常高興。尤其是室內的一大羣天眞的小姑娘——從南俄克里米亞（Krimeo）島來莫斯科參觀的女學生——都喜的不想睡覺，一個個都披着睡衣起來。這樣便在寢室內開了一個小小的歡迎會。他們要求我報告一些中國的情況，並七嘴八舌地問了我一些中國的事，以及我在歐洲旅行中的見聞。R女同志用世界語作了我們中間的翻譯。那克里米亞學校的女教師，向我致了簡短的歡迎辭。中間有一個猶太人說了幾句猶太語，一個韃靼人說了幾句韃靼語，都表示歡迎之意。大意是如此，他們都是東方或亞洲弱小民族，在革命以前和中國民族處着同樣的地位，現在他們是自由了，却對着正在解放鬥爭中的中國民族表着甚深的同情。接着一羣十七八歲的克里米亞姑娘們唱了一曲南俄的民歌。最後是大家站在床前大聲歡呼，聲音震動寢室的四壁，驚破莫斯科夜半的靜寂。

我忘却了剛纔的寒冷，忘却了一日間的困頓。我興奮了，我感動到下淚。飽喫了一

頓茶和餅干後我便倒在床上睡下。這一晚我有着一生中少有的甜蜜的熟睡。

克里米亞的女學生們第二天午後便向列甯格拉出發了。分離前她們還要求我和她們合拍一個照片，留作紀念。

無產者旅行社

現在我把無產者旅行社的內部組織和這公共宿舍內的日常生活，在這裏說一說。

蘇聯政府對於國內的旅行事業，尤其是勞動者的旅行事業，特加深切的注意。國家經營及補助各種旅行機關，輕減勞動者的旅行費用，以求國內旅行的普遍與發達。不單像別國政府那樣，想從旅客數目的增加以謀鐵道運費及財政收入的增益，除此

以外還有更廣大的目的。蘇維埃聯邦的領土包含歐亞兩大陸的大半部分，從北冰洋岸直到黑海，從太平洋岸直到波羅的海。在這中間人種宗教與語文，又是非常複雜。所以這廣大的帝國不但為一般外國人所不能明瞭，便是蘇聯人民也不易相互瞭解國內各地的情形。但社會主義的建立，必須先謀一般人生活的整齊化，集體化。在這廣大的繁複的領土與民族中間，求整齊與集體化，是非常困難的。這只有使各地的人民多得旅行的機會，常能和遠處的人民相接觸，方能改變各個特殊的生活方式，以漸歸於整齊。此外農民與工人，鄉村與都市的隔膜，為社會主義建設上最大的障礙。蘇聯政府竭力使工人有到農村去旅行的機會，又使農民有到都市去旅行的機會，便是為了要打破這重障壁。

蘇聯國家經營的旅行機關，最大是 Intourist，是專為招待外國人的。這國營的旅行社在全世界各大都市都設有支社，凡游假的旅客，護照、車票、船票、旅館、膳食一切

都可委託他們代辦，非常便捷，只是費用收的頗貴。至於無產者旅行社(Proleta Turisma Unuigo)則性質不同，乃專爲蘇聯內部的勞動者旅行家的便利而設的。是一種合作社組織，但有國家津貼，收費甚爲低廉。在全國各地都有無產者旅行社的公共宿舍，專爲各地旅行的勞動者而設，在莫斯科市內，據說有十餘處。我住的福金街二號便是此種公共宿舍之一。

這宿舍的內部構造，和平常中下等旅館差不多。不過旅館有着單人或雙人房間，在這裏只有總間，每一間內放着十二隻到二十隻的小鐵床，和醫院的三等病房一樣，設備非常簡樸，但收拾得頗爲清潔。男和女有時在一個房間睡覺，大家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另有一個大房間是寫信和閱讀書報的。飯是在樓下食堂喫。每天三頓。早餐茶和麵包和鷄蛋或魚卵；午餐湯和肉和菓醬；晚餐湯和魚卵和布丁。房錢每天是一盧布十科貝。飯是先付錢買票，憑票到食堂自己端的，每天三頓只費一盧布半，這比在新

聞記者食堂的價目便宜多了。

旣然是勞動者的宿舍，所以只有管事員，沒有侍者和「僕歐」。床要自己動手疊，菜要自己到櫃上去端，洗臉是在一個盥洗室內用冷水冲的。這些在過慣窮學生生活的我，並不覺有什麼困苦。在我覺得更方便的，是可以不拘禮貌。在西歐的布爾喬的旅館內，你要衣冠整齊方能上食堂，還有種種繁瑣的禮節。在這裏一切都毫無拘束，衣服歪斜些不要緊，高聲談話也沒人干涉。大家都像一家人，過的全是天眞的樸素的自由的生活。

我在這一星期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團體生活的樂趣。在這裏大家的生活是齊一的，同一樣的睡覺，同一樣的喫飯，全沒有貧富高下的分別。各人都顯出十二分的滿足和愉悅。各人都覺得別人的生活全和我一樣，因此計較心和羨慕心完全消失了，大家就同自家兄弟一般。這種集體生活的快樂是住居在巴黎、柏林大旅館內的闊客所

夢想不到的。

幾個同居者

但我在這裏却是被特別看待的。因我是一個不平常的客人，又是從遠道來的，所以管事員和同居的旅客，都把我另眼相待。他們讓我睡在靠近火爐旁的一隻床上。喫飯時我不愛喫的菜，他們特別替我換了。茶是喫雙份或三份的。（錢仍只出一份。）同居的人每晚都拿出點心來請我喫。這樣的優待，在我反感着不安了。

在我的床對面睡的是一個高加索人，一個又高又大頗像蒙古人臉相的人，據說是來莫斯科開會的農民代表，每天晚上睡覺以前他都和我講話，我一句也不懂，但從他那誠摯懇切的表情，我已明白了大半的意思。後來他在列寧的相片的後面，用阿拉

他文題了幾行歪歪斜斜的字，送給我當作紀念。他那副天眞的可掬的笑容，至今還反映在我的眼簾。除他以外，在這宿舍內還住着好幾位從東方的蘇維埃國土來的旅客，可惜我在他們面前是一個啞巴，不然一定能從我們的對話中，找出許多有趣味的材料。

在宿舍中只有一個從鄰省來莫斯科旅行的機器工人，還能勉强和我講幾句英國話。後來的幾天，去參觀工廠，他陪了我一同走。他曾在美國作過十七年，在福特汽車廠也曾做過工。兩年前方回俄國。我問他在美國做工，和在蘇聯做工比較如何。他很乾脆地答說：『在美國當然可以多賺錢，但在蘇聯却可得到精神的愉快。』他又說，據他兩年來的經驗，他是再不想離開蘇聯了。

我故不能忘却的是宿舍內一位管賬的姑娘。是一個嬌小而又幹練的女子，年紀還不滿二十。宿舍內大半的事務都由她管理。見了無論那個客人，都愛開幾句玩笑。這

大概可算是典型的蘇維埃少女罷。有一天，她指着我手指上的戒指，問R女同志這是什麼。R女同志便說這是我的結婚戒指。於是這位管賬的小姑娘便彎着腰笑個不止。我問R女同志她笑什麼，R女同志總說，在蘇俄是沒有人戴結婚戒指的；夫婦間的情愛，要用金屬的小環來作保證，這樣的事現代的少女已看作是一件大笑柄了。

五日休息制

因爲第一天太疲困了，第二天早晨醒得很遲。同屋子的人都已起床了。壁上的日曆，紅色的一頁已揭去，換成了黃色的。上面寫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幾個大字。我們知道俄國正在進行曆法革命。但關於一般曆法的改革，還正在考慮中，現在用的曆，還是和各國通行的曆一樣，只是星期却已廢除了。自從五年計畫實施以後，勞動者

每隔四天，休息一天。休息日各人不一樣，是輪流着休息的。因此工廠的工作是整年不停的，工人的工作日，却比從前減少了。星期的名稱，完全消失。大家都已忘却那一天是星期日。這種辦法給與宗教信仰者以一重大的打擊。因爲星期本是從基督敎遺留下來的一種習慣。在無神論者的蘇聯人民，本來用不到這種七日休假的制度。現在日曆大多是用五種不同的顏色來分別日期。例如第一天是紅，第二天是黃，第三天是綠，第四天是橙，第五天是青，第六天又是紅的。每個工人也依休息日的顏色分班。例如紅色日休息的工人，只要看到日曆上的紙是紅色了，他便可以休息一天。此外可以類推。這種方法除上述的優點（反宗敎，增加工廠工作，減少工人的工作日）外，還有別的好處。在別國行星期制的，每到星期日或星期六日，各處的商店，戲院，游戲場，必擁擠的不堪，而在平時則顧客寥寥。行五日輪流工作制後，便沒有這樣的弊病。此外在統計預算上也有不少的便利。

可是當這種新制度採行的開始，聽說也頗感到一種困難。因爲輪流休息的辦法，往往使一家人不能有一個共同休息的日子。例如一家五人，在五處工廠做工。父親被派定紅日休息，母親黃日休息，女兒綠日休息，大兒子橙日休息，小兒子青日休息。這樣，父子母女整年都不能在一處游玩，一處休息。這根本是把家庭生活破壞了。在蘇維埃聯邦雖然一切都向社會化，集團化的方向走去，不但沒有把家庭生活看作「良風美德」，而且因婚姻制的改革，離婚的便利，婦女的經濟獨立，公共育兒室，公共食堂的擴張，家庭已有日趨崩潰的形勢，但是在目前，勞動者大多數還保持着家庭的習慣，所以在五日休息制初行的時期，頗感到許多不便。但後來經政府竭力推行，並於分派休息日期時，注意實際情形，在可能範圍內，依工人志願，以決定其休息日。到現在五日制已成了一種非常便利毫無窒礙的制度了。

盲詩人的消息

早餐後，走到街上買了一份英文報"Moscow News"，仍回到寓所讀着，一邊等候R女同志。因爲她約着今天向郵局請了假，來陪伴着去游玩。實在，如沒有她陪伴着，我便成了聾啞盲人，不懂得一句話，不認識一條路，偌大的莫斯科，我眞不知道到那裏去纔好啊。

直等到下午一時，R女同志纔來寓所，我們便出去先到車站取出了一些行李。隨後同到蘇聯世界語會總事務所，請求那邊的同志介紹了去訪問V. O. K. S.（蘇聯對外文化聯絡會）。在蘇聯世界語會內，遇見五六位世界語同志，並且得到了七八年前來中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的確實消息，這使我得到意外的喜悅。因爲當我出國的

時候從日本方面得到消息，說這位不幸的詩人已經死了。我不敢相信。在法國，我用了種種方法託在俄友人設法探聽，可是不曾接到過一個確實的答覆。這一次，我在莫斯科世界語會，遇到一位愛羅先珂的朋友，纔知道盲詩人好好地活着。後來我遇到幼年時教他世界語的老師J同志，他也得到同樣的報告。據他們說，愛羅先珂不但沒有死，而且比以前更愉快康健。他的興趣非常好，和以前一樣地『幹着使我們明眼人慚愧的事』(J同志說的。)在前年去年的暑假，他都到堪察加的北冰洋面上，坐着破冰船去探險，這幾乎是不能使人相信的。在以前的幾年中，他都在莫斯科當日文翻譯和教師。要是我來莫斯科早了五個月，還能和他見面。現在他是在烏克蘭的一個盲童學校教書，離莫斯科有二十四小時的火車。可惜路太遠了，我不能去看他，不然，我可以和他訴說七八年來的別情，而且可以知道他最近的生活感想。無論如何，我相信他現在不會像在北京的時候那樣，天天嚷着住在沙漠中的悲哀呢。

到莫斯科世界語會時，已經是下午四點了。到V.O.K.S.去已太遲，所以約定了明天再去。R女同志說，福金街二號今晚有一個盛大的集會，她和我都被邀請作客人，所以我們必須早回去。因此我們只在街上走走，買了些零物，便回到寓所了。

煤油、鹽、麵粉和傻子的故事

在街上，經過了一個廣場，現在是把這地名忘却了。在那裏是用繪成色彩的木板，製成整隊的兵士、工人、機關槍、步槍等半面的彫像，形式如新派的戲台佈景。據R女同志說，今年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二十五週紀念，這幾天剛過了紀念祝典，在二十五年前，政府軍隊與工人會在此處巷戰，相持數日之久。現在廣場上陳列的，便是當時血戰的實況，

在莫斯科街上的商店，尤其是大商店數目非常少，而且這些商店全沒有顯明的市招和誘人的 window show，因此使莫斯科街市顯出與其他世界大都市的街市完全不同的面目。在革命後的莫斯科，只有在新經濟政策施行的初期，私人商業曾經繁榮過一時。但現在私人商業幾乎完全消滅了。只有在偏僻的街巷火車站旁，還有些投機的小販，從鄉間運來麵包及糖菓，在地上擺着攤販賣。此外一切批發零售的商店全是國營，或由合作社經營的。平常日用品的商店，是分區或分業設立。住居在每一區域，或每一種職業的人，都各有指定的商店。除了糖菓玩物等不重要的物品，可隨意購買外，一切日用必需品，必須憑劵購買，各人都有限制。這劵又分成五個等級，對於第一級，即小孩與老人購買限量最大，其次用爲體力勞動者，再次爲公署及機關職工，再次爲自由職業者，限量最少者則爲教士，前貴族資產階級及一切不勞動者。

在未來俄國以前，我據許多經過俄國的人報告，都說莫斯科的商店都非常擁擠，

每家店舖的門口，都有數十百的顧客等候着，主婦須從早晨等候到旁晚方能買得一塊麵包。我在莫斯科也看到同樣的情形。每家店舖門內都擠滿了人。有幾家門外排成了很長的「尾巴」。據說近來已好多了，在數年前商店買客還要擁擠的多，這是因爲商店數目少而憑劵講買每次有限量不能多買的緣故。但不是這樣，便不能防止投機，這自然是過渡期不可避免的困難。

經過了一家煤油店舖的門口，門前的「尾巴」特別長，從街頭起一直接到街尾，大約兩三百人，都是不作工的老人或管家婦，手提着鉛罐或油瓶，在等候着。我便問R女同志，蘇聯不是產出很多的石油，而且每年大量地輸出國外嗎？爲什麼煤油店舖的門前有這麼長的「尾巴」。

「俄國的石油多，但是俄國傻子更多，」R女同志回答說。

她繼續着說明。她說俄國的石油是儘你怎樣用也用不完了。但有的傻子會相信

謠言，恐怕買不到石油，都爭先恐後地去買來藏在家裏。因此石油店鋪的門口，便擠的水洩不通了。她說，有一次，莫斯科忽然起了一個謠言，說是國營商店的鹽快賣完了。於是全莫斯科的管家婦都擠到店舖裏去買鹽。俄國的鹽當然不會缺乏的。但鹽是隨時從海濱運來，在莫斯科貯存的數量不會十分多。假定每人多買了半基羅格蘭姆，莫斯科三百萬人口，一下子便多買了一百五十萬基羅格蘭姆，自然不到兩天就買完了。第三天莫斯科眞的買不到鹽，於是便起了極大的恐慌與紛擾。過了四五天，大批的鹽從海濱鹽廠運來了，大家纔知道是「庸人自擾」。

『我再給你講一個有趣的故事。』R女同志笑着說：『我們鄰居有一個老年婦人，是在紗廠做工的。有一天，她和我說，她遇到一個大困難，就是家中的麵粉太多了，堆積了半間屋子，沒地方去貯藏。我問她爲什麼會藏了這麼多的麵粉。她說是三四年來積存起來的。原來她的糧食劵上規定，每五天可以買一基羅格蘭姆的麵粉，預備人家

做糕餅點心的。但她只是孤身；平時就在工廠食堂內喫飯，從不做點心，可是每隔五天，她一定去買了一基羅格蘭姆的麵粉，放在家裏，積了三四年，就堆滿半屋子了。於是我勸她麵粉沒有用，以後不要再去買了罷。這位老婦人便說那可不行，因爲這一基羅格蘭姆的麵粉，是寫在劵上的，是她應得的權利，權利是斷不能放棄的。你想，這樣的傻子，你能在別處找到嗎？」

社會主義的生產競賽

回到福金街二號，已經是午後七點了。在我們的寓所的樓下的大禮堂內舉行的旅館勞動者的大會，便即開始，我和R女同志都以來賓的資格被請出席。這次大會的目的，是爲了比較莫斯科和列寧格拉兩地旅館業勞動者生產競賽的結果。我從R同

志和大會主席某君的說明方總明白了所謂「社會主義的生產競賽」的理論與實際，

勞動者的生產競賽，從表面看來，似乎是和社會主義的理論相衝突的。一般布爾喬的理論家，攻擊社會主義，都說社會主義一旦實行後，個人的競爭完全消滅，人類進步必將停止。因爲物質利益爲一切人類活動的唯一動機，社會主義者既反對一切爲個人利益的競爭，則人類必相率游惰苟安，社會將日見退步。這種論據初看是很近情理，但在實際上，却完全不明瞭馬克思主義的眞諦。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並不否認物質利益爲人類活動的鵠的，並不否認人類的競爭心、好勝心爲社會進步的要素。不過對於競爭心、好勝心的如何利用，却與布爾喬的觀點全然不同。布爾喬雖主張個人自由競爭，但在布爾喬社會中，只有資本家與資本家可以互相競爭，無產者却始終處於奴隸的地位，絕對沒有爲個人利益而競爭的可能。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唯有在階級

的統治消滅以後，人類方能有平等的機會自由發展其個性與幹才。又布爾喬社會的競爭是完全自私的，爲個人利益的。大資本家壓倒了小資本家，使小資本家成爲無產者，永遠淪於奴隸的地位，無所謂憐恤與同情，這是資本主義的個人自由競爭所造成的必然的局勢。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則不然。個人對個人的掠奪既完全消滅，各個人都爲了社會全體福利而競爭生產。這競爭的結果，並不專爲個人利益，却使全般生活標準提高，因之能力弱小者與能力强大者同樣蒙其利益。競爭愈烈，則一般人的物質生活亦愈提高，這樣方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競爭的眞義。

在布爾喬社會，人都爲自己的物質利益而生產，絕不顧及全體的利益。例如加拿大的富農，因爲要抬高麥價而焚燒大批存儲着的食糧，却不想到世界上有着無量數嗷嗷待哺的饑民。又如資本主義國家厲行產業合理化而不顧到大批工人將因此貧窮失業。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則不然。人爲了社會全體的利益而生產，但社會全體的

利益，仍是各個人的利益。所以一切生產的增加和改良，是於整個社會有益而於任何個人都無傷害的。以此為目的的生產競爭，方是公平的合理的生產競爭。

在蘇維埃聯邦革命的初期，工人和農民大多數還保持着布爾喬社會的傳統觀念，以為工廠與農場收歸國有之後，一切的生產物，既全屬於國家，所以個人不必為生產而努力。在革命初期生產力的減退，工農業的衰頹，成為普遍的現象。後來經過數年的宣傳訓練，勞動者開始明瞭他們是為公共的利益也是為自身的利益而勞動，一切生產增加，唯一的享受者為勞動者自身，不像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增加的生產都裝入資本家的口袋，而於勞動者全無利益。因此增加工廠生產率，減低出品成本，在蘇維埃國家，乃以工人自己的志願、工人自己的努力來企圖。為社會全體增加生產，視為工人最大的榮譽。在五年計畫開始以後，又起了社會主義的生產競賽的運動。所謂社會主義的生產競賽，乃是大衆直接干涉生產的意思，這是代表蘇維埃經濟發展的一個新

的階段。在以前，工廠雖屬於工人所有，但工人只是支配工廠生產而已。一切生產計劃、組織及程序由工人所組織的工廠委員會及生產會議決定。工廠主任、工程師、技師在生產會議內，向工人提出工作計畫，由工人辯論修正，經全體決議後，方將計畫實行。在這時期工人對於生產只限於支配。但到了五年計畫的時期，單是支配生產已是不夠了。第十六次蘇聯黨代表大會宣言，非有大衆的積極干涉，五年計畫的實現實爲不可能。果然從這時期起蘇維埃經濟由工人支配生產的形態，進而爲工人干涉生產的形態。最初一部分工廠內的少數青年工人組織所謂「衝鋒隊，」預定某種的工作標準，自告奮勇，以求貫徹。同時並向其他工人竭力宣傳鼓勵，激發羣衆的熱情，利用此熱情以謀生產的增加。這「衝鋒隊」的員額不久擴充到工廠全部，後來又擴充到了別的工場工廠，乃至於全蘇維埃的托拉斯。

這些「衝鋒隊」決不是胡亂定出一個標準，因爲這樣一定是要失敗的。他們是根

據了可靠的統計數字，按照他們的日常工作的經驗，來定一個生產標準限度。大多是由各工廠的代表大會決定。決定標準限度以後，便訂下競賽契約，訂了契約以後，到了決算時期，如生產能力能超過預定限度達最高點的，在工人中間認為最大的榮譽，反之如不能如約達到限度的，則視為怠惰恥辱，由工人大會判定名譽的懲罰。

競賽契約的方式，有由一工廠的全體工人與別一工廠的全體工人互訂的，亦有由各個或各班工人相互訂定的個人的生產競賽，最初是由奈羅福敏（Noro-Fom-be）紡織廠一個女工所發明。這女工曾經宣言：「我將竭我的能以力提高工作生產率，同時並竭力減少布匹的線紋脫漏，竭力注意織機的清潔保持。我已約定了和我同班工作的幾位同志共同加入」。經這位女工的發起，不久奈羅福敏廠約四千名男女工人都加入了競賽，在短時期內該工廠的生產率提高了許多，產品的成本及耗費也大見減少。

最普遍的例則爲各工廠的相互競賽。這是由同業的、或非同業的兩方訂了契約，在某限期內，增加生產効率。例如 Vyberg 工廠的工人約定減低生產成本超過原定計畫所定的數目，約 Kamensk 造紙廠的工人共同加入競賽。結果，Vyberg 廠的生產成本減低百分之一四・五，其五年計畫所規定的減低成本只百分之七・五。同時 Kamensk 紙廠經競賽結果，造紙成本減低百分之五・七，紙版成本減低百分之一八・三，機器修理費減少百分之二十。此造紙廠工人又約他家造紙廠工人共同加入生產競賽。不久全體造紙業的成本大大減低。

一切的生產競賽，都是由工人自動發起，自動決定標準，自動訂定契約。這工人直接動員，爲增加生產而鬭爭，是五年計畫時期蘇維埃經濟的一個特徵。

政治、勞動、行樂

不單是工廠勞動者，此外機關的職員、文化勞動者、自由職業者、農業勞動者，也都用社會主義的競賽的方法，促成物質的精神的生產的增加，謀一般生活標準的提高。那晚我所參加的集會，便是在蘇聯常見的競賽大會之一。這次是莫斯科和列寧格拉兩地旅館業勞動者的生產競賽。出席的有這兩大城市的旅館業服役者的代表一百五六十人。在這中間有旅館經理、會計員、侍者、僕役、廚娘、搬運夫等所派的代表。莫斯科無產者旅行社的主幹致開會辭。R女同志在我的耳旁把演辭逐句翻譯，大旨是講五年計畫實施的情況，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資本主義國經濟恐慌與蘇聯工業化急速成功的兩相對比，帝國主義國家對蘇聯的壓迫。他說目前世界無論那一國，都有數十

萬到數百萬的失業工人，只有蘇俄不但沒有失業問題，而且今年蘇俄工業還缺少二百萬名的勞動者，正苦無法補充；單就這一點已足證明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優長。最後他又說旅館業勞動者應該努力增加並改良工作，以促成五年計畫的實現。因為旅館業看似不重要，實在和社會主義的建設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例如廚房的飯菜如燒的不好，滋養料減少，則各地來旅行的勞動者的健康將因而受損，結果一般的生產率，自然因而減低。又如各旅行社所張貼的壁報，內容往往敷衍成篇，絕少精意。這雖然是小事，但來旅行社住宿的，各國的旅客都有，他們讀了這些膚淺空洞的壁報，會對蘇維埃國家生出不良的印象，這間接也影響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所以旅館業的全體勞動者，都應嚴守生產紀律，不論大小事務，都應用全部心力去幹，方能掃除五年計畫前途的障礙。

經過這演說後，大會公推主席團五人，其中一個是廚娘，一個是搬運夫。我因為是

遠客，也被選入主席團，這在蘇俄的習慣，是當作一種對公共的客人的敬禮。我想辭却，沒有得到許可。於是我起立，向大會表了謝意並略說了幾句祝賀蘇聯五年計畫從速實現，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話。我受了全場的鼓掌歡迎，不覺面紅耳赤。

但被選入主席團後，我不得不移坐到主席台上去，這樣便和R女同志隔離的很遠，沒有人替我翻譯，於是我對於以後各人的演說辯論，反不甚了了。大概以後是由莫斯科和列寧格拉兩地旅館業的代表分別報告最近時期的工作情形和生產增加的實況。有關於一般營業的報告，有關於房屋清掃的報告，有關於廚房的報告。經兩地比較的結果，大體都超過了競賽契約所定的限度，對於各門的生產增加情形，兩地的旅館業勞動者互有短長。隨後又由各代表提出關於改良旅館業務的種種建設，並指摘現在的錯失，雖極細小的事件，都經過長久的討論。這樣的會議，一直延長到三個鐘頭。到了晚間十點，方纔唱着國際歌，宣告閉會。

會議完畢以後，舉行宴會，全體的代表來賓一齊列席，菜是比平常特別豐厚，因爲在競賽會議的時期，廚娘們自然格外要顯出些手段。不過在蘇俄的一切宴會裏照例是沒有酒的。宴會完畢，大家仍回到禮堂，舉行盛大的同樂會。在這同樂會中跳舞和遊藝的節目相互間隔着。大家經過一頓飽餐後盡情的游戲作樂，把適纔三小時的會議的疲勞，生產競賽的工作的緊張，一時間都忘却了。

游藝的節目，大部分是具有地方民族色彩的。演藝的人大概是預先邀請，或者是請住在旅行社的各地旅客擔任。其中有克里米亞的革命歌曲，高加索地方的雙人對舞，土耳其音樂，韃靼的民歌及跳舞。歌舞的人都著了本地特異的服裝，光怪陸離，東方色彩，非常濃厚。最後更有一個節目，是朗誦著名無產作家瑪耶闊甫斯基（Mayakovsky）的詩篇。

每一個節目終了時，夾着十分鐘的跳舞，在場的人一齊加入。我在那裏第一次看

到並且加入了蘇聯的民衆跳舞。在蘇聯跳舞藝術也和音樂、圖畫、彫刻一般，是普羅化、的民衆化的，和布爾喬的跳舞藝術完全不同。據說，在俄國為提倡民衆的娛樂起見，由國家開設跳舞學校，聘請跳舞教師。在春夏間，天氣較溫暖時，跳舞教師常在街上把來往行人攔住，教以新式跳舞。這跳舞不像目前流行於資本主義國的跳舞的那樣整齊矜持。本來俄國的民間跳舞，都是一種羣體的集團的跳舞，革命後的新派跳舞不過把這種民間流行的跳舞，加以改良而已。最普通的舞，是把在場的人分成男女兩列。先由女的邀成一個大圈子，拉着手，按着音樂調子左右行走。男的也在圈子外邊站着。待音樂停止時，女的一齊向外捕捉近旁的男子，如男子逃避的不快而被捉住時，便被送到圈子的中心席地而坐，算是女子的俘虜。隨後是由男子捉女子，也是如此。這一類的跳舞，會激發大衆的狂歡，使你感到羣體生活的愉快。比之於布爾喬社會一對對男女各自擁抱着的跳舞，完全是另一種情調。

這樣，以政治宣傳，工作報告開始的會議，却以大衆歌舞歡笑終場。據說，這是蘇聯勞動者集會的一般的程序。政治訓練、勞動、狂歡的行樂，這代表了蘇維埃生活的三方面。

標準工人住宅

一月三十日午前，去M. N.街訪問V. O. K. S.的總部。今天R女同志不能來，她派了她的第二個兒子R同志來替我引路。R同志是十六歲的少年，在公立學校的最高年級讀書，不久快畢業了。今天是校中的假日，所以代替了他的母親來陪伴着我。他到了我的寓所，和我談了些關於學校生活的話後，我們便一同出門。

V. O. K. S. 是「蘇聯對外文化聯絡會」這幾個字的縮寫，這會的目的是謀

蘇聯和外國學術文化界的聯絡合作。主要的工作是向國外交換學術書籍雜誌，並自己用英、法、德、世界語發行一種介紹蘇維埃文化生活的月刊雜誌。此外是招待來遊蘇俄的一切外國文化工作者。會所是前貴族的邸第，建築和設備都非常富麗而舒適。辦事員大部分是女子，能講英、德、法語和世界語。我會見了主任，索取了一些關於五年計畫及蘇聯文化事業的報告小冊，隨後又約定了次日由他們派人陪伴去參觀克列姆林，共產黨大學和無產作家協會。因為我特別感到興味的，是在文化方面的設施，所以他們允許介紹我去參觀上述的地方。可惜後來因為約期困難，時間匆促，不曾去訪問無產作家的團體，會見幾個大名鼎鼎的新俄文藝代表，我至今還引為遺恨。

可是憑着完全偶然的機運，當我還未出 V. O. K. S. 大門，便得認識了一位無產作家U同志。U同志是世界語者，本是來 V. O. K. S. 訪友的，在門口和我們撞見了，他帶着好奇試探的心理，用世界語向我問話。當他發見了我是從中國來的世界語

着時，便十分的喜悅。我們雖然是不意地相遇，後來却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盡力援助我指導我。我在莫斯科雖只七天的短時間，却窺測了蘇維埃生活的種種方面，這一大半應該特別感謝U同志和R女同志他們兩位。

U同志是在蘇維埃聯邦內韃靼共和國的首都喀散（Kasan）出生的，今年還不到四十歲。在革命以前，他是喀散地方的紡織廠工人。一九一七年加入布爾希維黨，投身紅軍。赤白戰爭中，建立過軍功，被任爲司令官。內戰停止後退伍，開始用韃靼文寫小說，並充莫斯科幾家報紙的文藝新聞記者。這樣他便成了革命後新興的許多無產作家之一了。

我問他蘇俄文人及智識工作者的生活待遇怎樣。他說，一般地對文人待遇並不比普通體力工人優厚。他要是單靠了寫小說賣稿，生活不見得十分富裕。可是他除了無產作家的資格外，同時是紅軍退伍軍官，是有功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人，因此他可以

享受到許多特權。例如住宅的租金特別便宜，幾等於免費。在街上坐電車不必買票，及其他等等。（最有趣味的，是莫斯科電車照規則只許從車尾上去，從車前下去，但他憑了紅軍退伍軍官的證書，却可以從車前上去，從車尾下去。）因此他對於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

U同志約了我們去他家中午飯。飯後方陪伴了我去參觀他的家在莫斯科城南近郊地方。我們坐了約四十五分鐘的電車，下車又步行了約十分鐘，方纔到他家。這一帶盡是新建的工人住宅。每一所的住宅，都佔着大約十餘畝的地位，都是七層或八層的鋼骨水泥建築，據說是模倣美國式的家宅建築。外表是灰白色，四周是一大片草地，全被雪蓋上了。室內的設備很樸素，但升降梯、自來水、煤氣灶、熱水汀、電燈電話，各層都設置齊全。這樣的大住宅，在隣近一帶有四五所，都是同一樣式，都是在這兩三年來新建的。U同志指示給我近旁的一所，說是專給聘來的美國專家居住的。此外則是平常

工人住宅。每一住宅內，大約可以容納四五百的工人家庭。據說中國工人也有住在裏面。U同志和我說，同樣的標準工人住宅，在莫斯科的四郊，正在大量建造着。在五年計畫完成以後，莫斯科的工人的大部分，都可以得到這新式家宅。這樣住宅恐慌的問題，便可以解決了。

新式的工人住宅，不但建築的外表是完全一致的，室內的佈置設備，也差不多是一個式樣。每一個工人家庭大概佔着一間十餘平方尺的屋子，窗是向曠地開着。日光和空氣在郊外是不愁缺乏的。這一間屋子便當作了寢室餐室和休息室。另外又有兩小間附屬屋子，一間是浴室兼便所，另一間是灶房。燒菜是用煤氣爐，屋內都有熱水汀，所以很清潔。電話是住宅內各戶公共用的。無線電收音機則每家都有一具。房租沒有一定的數目。因爲國家做了房東，工人按照收入多少來付租金。收入較多的租金付的多，收入少的租金也少了。U同志的住屋，也是照着上述的式樣。每月連房租、電燈、自來

水、煤氣、電話、無線電費，總共是付出三十盧布。這數目照着莫斯科的生活程度，簡直只夠作零星耗費，等於不付房租。但因爲是紅軍退伍軍官的緣故，他才能得到額外的便宜，平常工人所付出的，大約要比這數目更多些。

無產文藝者的「家」

U同志和一位在莫斯科戲院唱歌的姑娘（U同志向我介紹她時，稱她叫「姑娘」"Fraulino"）同居着。這位姑娘也是韃靼女子，正在二十餘的妙齡。服裝却很樸素，顯出一種健全的天然美。因爲他們兩個都是文藝工作者，所以他們的住屋，除和平常工人住屋一樣樸實外，却充滿着東方的藝術美的情調。屋子裏靠近窗口，放着一隻低矮的榻，上面舖着東方圖案的毛氈。榻旁放着一隻鋼琴，此外是幾隻低矮的小凳，一隻

躺椅。書籍散滿在地上。壁上滿貼着五光十色的照片圖畫，找不到一塊空白。進門處靠壁是一隻長畫儿，畫儿前面放着一張方形的餐台，這陳設有一半像中國舊式家庭的客廳。壁紙和地氈的圖案是紅綠相間的構成派繪畫。初進室內時會使你覺得頭腦昏眩。

談了一回天以後，那位姑娘就到廚房裏去燒菜，不久開始午餐。食品很簡單，一盤黑麵包，每人一盆牛肉菜湯，一大盤糯米做的煎餅。我最愛食甜的，這煎餅頗合我的口味，據說是韃靼風的製法。在平常他們很少自己做飯，各人都分頭在公共食堂裏進餐，今天是爲了我特別在家做飯的。

帶着布爾喬亞社會的心理習慣，我不十分明瞭U同志和他所稱爲「姑娘」的韃靼女藝術者中間是怎樣的關係。我冒昧地開口問着：

「請恕我無禮的問話，你們兩位是不是算作一對夫妻呢？」

『爲什麼不是？』他詫異地反詰着。

『那末，你們是曾在地方機關註冊結婚了罷。』

『不，我們不曾有過這樣的形式。在蘇維埃國家，只要有同居的事實，法律上便認作夫婦。一旦同居的事實終止，就認爲離婚。註冊不註冊，倒沒有關係。』

『那末爲什麼又有婚姻註冊制度呢？』

『在這過渡期，家庭生活還不能完全打破，自然非有婚姻註冊不可。在革命以後的幾年中，辦理婚姻註冊的機關，工作非常的繁忙。因爲一般女子，恐怕生下孩子，做父親的不肯負責、所以都到婚姻註冊機關裏去登記結婚。但結了婚不久，又去註冊離婚的非常多。到了近年，這種事情漸漸少了。勞動者頭腦中婚姻的觀念漸漸破除。戀愛的兩方既相互信任，而有同居的事實，何必再要有註冊結婚的形式？只有一部分的男女，因爲註冊結婚時可以多購一套新衣新鞋，所以去註冊。此外去到婚姻註冊所裏請求

結婚的人却很少了。」

「我向來知道蘇俄離婚結婚，只消由本人去註册就完事，這已經是十分自由了。現在連註册的事都漸漸減少，這樣不是根本把婚姻制度消滅了嗎?」

「婚姻制度的消滅，爲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的結果。在目前的蘇俄，社會主義雖還未完全實現，但婚姻制度已根本動搖。在現在，甚至男女的固定的長時期的同居，也已視爲非必要。有許多男女長期同居，大都只是爲了住屋困難的緣故。例如，我們倆雖然相愛着，但也並沒有永遠同居一處的必要。不過因爲我們那位姑娘想找一所比較安適的住屋，非常困難，所以暫時兩人合住着罷了。」

「這樣的自由的男女關係，你覺得很滿意嗎?」末後我還要來一個愚問。

「自然，」他說：「爲什麽不滿意?阻隔着男女兩人間的一切物質的形式的障壁，既然都撤除了，這樣我們方纔有眞的幸福的戀愛生活啊。這樣的幸福生活，在革命以

前，我們是做夢都想不到的。」

男女關係是解放自由了，但所謂「家」這東西，却因此而瓦解而消滅。宗教與家庭，這在前時代所視爲人類文化生活的最堅固的礎石的，現在却被十月革命的急流所衝碎了。典型的家庭生活，至少像託爾斯泰、柴霍夫的小說戲劇中所描寫的家庭生活，在新俄國是已經不能再找見了。

民族文化與國際文化

與U同志閒談文學藝術，頗得了一些新的見解。

這是一個很大的Paradox：布爾希維克在政治的立場上，是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而在文化及藝術的立場上，却又是民族主義者。

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對於民族文化、民族語文、民族文藝，能像蘇維埃政府那樣地提倡保護。（當然我這裏所說的民族文化、民族語文、民族文藝並不是專指俄羅斯文化、語文、文藝。蘇維埃聯邦的內部包含着數十個不同的民族，而俄羅斯民族不過其中之一。把蘇聯的民族主義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視爲一物，這是最普通易犯的而又是最重要的錯誤之一。）革命以前，在「柴」的領土內，一般人只知道有一個俄羅斯帝國和俄羅斯民族。到了十月革命以後，除這俄羅斯民族以外，纔發現了烏克蘭、白俄羅斯、哥薩克、喬治亞、韃靼、亞爾美尼、Tadjiks, Khirgizes, Uzbeks, Tuscomans, Tadshiks, Krimea, Barhkiriens, Jakutions, Komis, Karakopaken 以及此外許多數也數不完，讀也讀不淸的古怪民族。不但發現了這一大羣的民族，而且更發現了這些民族所獨特的文化、語言與文學。在蘇聯境內各種語文都和俄羅斯語文有同樣的法律的效力。在我所經過的許多車站，上面所標的站名，都有四五種或七八種文

字並列着。國家發行的郵票、郵政明信片、紙幣用十餘種文字印成。國家印刷局用七八十種文字印刷教科書、雜誌、報章和文藝作品。其中有幾種文字，在俄皇時代是從不會印在紙上過的。

在文學藝術方面也是如此。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期的俄羅斯文學，如部介涅夫、柴霍甫等的作品，在技巧與思想上受西歐文學的影響很大，所以是世界性的。反之新興的普羅文學却是地方性的，鄉土的民族的色彩非常濃厚。在新興的音樂及跳舞藝術裏，也充滿着各種的民歌和民間跳舞的情調。普羅文藝的最大的源泉是民間文藝，所以牠不能不是民族性的。

就界U同志爲例罷。他是城市無產者出身，而且在早年便信仰布爾希維主義，投身到紅軍裏。他所寫的小說，幾乎全部是用赤白戰爭來當題材的。可是他却全用韃靼文來寫，而不用俄文寫，雖然他也一樣能寫俄文，而且俄文的作品比韃靼文的，能得到

更多的讀者，但他却覺得只有用他的鄉土的語文，才能忠實地表現情意。據U同志說，在蘇聯凡是在政治社會思想上站在革命前線的人，對於民族文化語文的保護，最爲固執。例如蘇聯政府近年曾主張把蘇聯內部所用的文字，都改用拉丁字拼音。但這個主張至今還不能實現，就只因爲幾個重要政治領袖堅决反對的緣故。反對的理由，是恐怕改用拉丁字母後語文的形式將要失其特殊的民族性。

這似乎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布爾希維克在一方面高唱無產者無祖國，而在他方面又要盡力提倡保護民族文化。關於這民族文化的問題，數年前，黨內的理論家間，也曾引起過劇烈的論爭。尤其是左翼的理論家，反對提倡民族文化甚力，但終於斯太林的主張得了勝利。斯太林所持的理由，以爲革命的最後目標，固然是創立世界的文化，以代替一切民族文化。但世界文化的產生至少要在世界革命成功了許多年之後。在目前的過渡的階段內，無產者的政權，只限於蘇維埃聯邦的國境。這樣創造世界文

化顯然是不可能。而且世界文化的創造，必須在各民族得平等自由發展其民族個性、民族文化以後。從各個自由發展的民族文化，混合結晶方能產出世界文化。目前世界的許多的小民族還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無從獨特發展其民族文化。所以第一步必須使民族文化解放發展，第二步方能產生世界文化。不然，如在蘇聯境內抑制各弱小民族文化語言的生長發展，徒然造成了俄羅斯民族文化語文的優越地位，以俄羅斯文化統一其他民族文化，這樣和帝國主義的同化政策，又有什麽分別？所以在目前這時期，應該儘力扶植各弱小民族文化、語文、藝術的發展。直到了政治的民族界限消滅以後，民族文化在相當時期內，還有培養扶植的必要。因爲民族文化愈充分發展，則將來世界文化的質量，亦愈充實豐富。所以在文化的見地上亦如在政治的見地上，布爾希維克主張以民族主義應付這過渡期。（當然蘇聯所提倡的是以社會主義爲內容，以民族爲形式的文藝，請讀者勿誤會。）

鄉蘇維埃和國立醫院

從U家出來，我們就在近傍附郭一帶散步着。這裏已是莫斯科市外，劃入鄉蘇維埃區域。U同志引導了我去參觀鄉蘇維埃的辦公處。這鄉蘇維埃內部的組織設備，和我在莫斯科蘇維埃所見的差不多，不過規模很小，辦事人不過十餘個。U同志介紹了我見那裏的祕書長，是工人出身，也是紅軍的退伍軍官。但是很和氣誠懇，不像莫斯科蘇維埃的辦事人那樣嚴厲。他親自簽名送給我一本俄文的紀念册。我們因時間不多，匆匆與辭而出。又去附近看了兩家醫院。

在蘇聯醫院完全是國家設立，而且是義務性質的。醫院都附設藥房。醫藥費分文不取。這兩所鄉醫院，規模並不大。但收拾得很清潔。在等候診病的人都不少。據說醫生

在新經濟政策時代，算是一種自由職業。但現在則一律作爲國家雇員，由國家發給工資。私人營醫絕對禁止。據說，在蘇聯現在最感缺乏的是牙醫生和牙科材料用具。因爲工人農民，一般患牙病的非常多。但治牙費用很大，向來是只有布爾喬亞方能踏上牙醫生的門。革命以後，勞動者醫藥費都由國家擔任。因此連最貧困的農民，都想去鑲上幾粒金牙，於是牙科醫生都忙的不亦樂乎。

中央電局

回到莫斯科市內，已經是傍晚燈火時分了。日同志邀我到少年先驅的大會堂去旁聽，但因爲時間還早，順道去參觀中央電局。

這中央電局是莫斯科市內大建築物之一。是高八九層的大洋房。低下是郵電總

局，六層樓以上是中央電報總局。U同志說這中央電報局是最近二三年內從新擴太改造的。設備都很新式，爲世界大電局之一，値得去參觀一下。但電局關防嚴密，平常人不易進去參觀。U同志向局內辦事人商量了有半個鐘頭。拿出他的黨證作保證，方纔允許我們進去參觀。坐了電梯上樓，又經過了數重門。每一重門都有O.G.P.U.的警察守衛着，要驗過通行證纔放行。出來時也是如此。

這是蘇聯全國電報通信的神經中樞。蘇聯和全世界各國以及蘇聯國內的相互交通，全是從這中央電局轉展傳達。規模頗宏大。收報發報全用自動機和異孔筒機械設置。據說都是倣美國最新式的裝置。每天收發及轉送電報平均爲二百五十萬字。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間，託洛斯基當人民外交委員時，震動全世界的革命政府對全世界的通電，便是從這裏拍發。

這中央電局的雇員有二千六百人，分日夜班輪流工作。每日勞動七小時，每五天

休息一日。工資每月自九十六至一百二十盧布，尚有許多補助工資如疾病保險等不算在內。工人是女工比男工更多。

少年先驅大會

因爲在中央電局，消磨了過多的時間，到了少年先驅大會，會已將近完畢了。這是在一所大戲院裏開會的。我們進去時，招待的人便問我們是不是正式代表，我們說不是，便引導我們在旁聽席坐下了。

會場的光景很使我喫了一驚。原來這廣大的戲院子，樓上樓下一千多個座位，全被天眞的勇敢的少年人佔的滿滿了。七八歲的孩子，坐在前列，略大些的在後列。最後列是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主席台上，坐着的也是十五六歲的少年人，只有一個是二十

餘歲的青年，據說是少年先驅的導師。少年先驅一律著童子軍式的服裝，戴着尖形制帽，紅色領帶，左臂上圍一條紅布。雖然滿場都是未成年者，秩序却是很整齊。傾聽演說，參加辯論，都非常認眞。每一次演說的走下台時，大家一齊鼓着小手掌。每一次樂隊奏樂時，都站起唱國際歌。

我們進去時，一個十六七歲的德國少年先驅的代表，正在高據着講台演說。聲音小而尖銳有力。說話時舉起他的小拳頭作勢。每說完一小段，接着便是雷一般的掌聲。我雖不懂得所講的話，却已感受到一種稚嫩而壯烈的氣分了。

這裏是充滿着另一種感情，和成人的集會不同的一種感情。這裏的空氣是表示着：這些少年先驅們的小小的肩膀上，能夠擔當的起整個人類運命的重擔子。未來原來是屬於他們的！

據說在蘇維埃聯邦孩子們從脫離母親的懷抱時起，比較優秀强壯的，都被施以

蘇俄教育養成自動自治的能力。從四歲至七歲的孩子；是被稱作「十月人」(Oktob-reno通「十月人」的原義，大概是指十月革命以後出生的孩子）從八歲到十七歲編入了「少年先驅」(Pionero)十七歲以上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共產主義青年團又是黨的後備隊。黨員是從共產主義青年團中挑選出來，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從少年先驅中揀選，少年先驅是從「十月人」中擇取，而「十月人」又是從勞動者的兒女中經過的層遞而重選錄的方法，纔能把無產階級中間最精華的分子，盡數吸收到了黨的隊伍裏去。

少年先驅的教育，並不是一種訓話式的公民教育，或黨義教育，乃是活的自然主義的教育。指導者用暗示和啓導的方法使兒童充分認識人與宇宙的關係，人與動植物的關係，認識生產與勞動的基礎智識尤其是使習慣於集團的生活，總之是以實現未來的理想社會為鵠的，訓練成適宜於社會主義生活的新人。那位少年先驅的導師

下台來和我談了幾句話，使我很感動。他說：『我們的理想社會不能在目前實現，只是因爲我們的成年人都是從資本主義社會長大的，都充滿了布爾喬的失德與成見，在成年人中間沒有一個「完人」。但是你看啊，這一些少年人，在新社會中生長，而又是從理想的教育制度中薰陶成就的，到了這些少年人長大的時候，社會將另換一副面目。』是的，這些少年人長大的時候，世界也將另換一副面目，至少我是這樣地相信。

會開完了以後，休息十五分鐘，接着是音樂會。有蘇聯各地的民歌、跳舞和管絃樂。第四節目開始時，U同志的女伴登場，唱了一曲韃靼民歌。唱完以後，便下台來，U同志要陪伴着她同回家去。雖然以後還有許多有趣的游藝節目，但因我一個人不識路，所以也只好跟着他們一同退出。我很滿意地回到寓中，因爲今天我的眼福耳福已不算淺了。

兩教授的會見

一月三十日十一時，V. O. K. S. 的代表和R女同志陪伴着去參觀共產黨大學。這共產黨大學是黨的理論的最高研究機關。科目自然以社會科學爲主體，但也有關於工程、機械等科目。學生有五六千人。大部分是工廠勞動者，或機關的工作人員，他們每天都做數小時的工，所以許多人都在晚間上課。在共產黨大學裏我所見到的圖書館、敎室及其他設備，和德法大學的情形差的不多。可是大學生的模樣，却全然不同。蘇聯的大學生，在我看來，一個個都是粗豪簡樸不修邊幅。有許多學生只着了絨綫襯衣去上課。既不是翩翩的少年公子，又不是戴近視眼彎腰曲背的寒酸書生。這只是因爲大學生都是勞動者出身的緣故。

蘇聯大學生有百分之七十，是勞動者的子女。在革命以前，勞動者斷不能送他們的子女去進大學。現在是恰巧相反。非勞動者的子女，要進大學，是非常困難的。

R女同志介紹我見伐爾加（Varga）敎授。伐爾加敎授是匈牙利人，和R女同志是素相識。他的著作我讀了已久。這樣一個世界的大經濟學者，驟然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倒有些張惶失措。誰知一見面以後，却全出於我的意想以外。原來這一位馬克思主義的著名理論家，只是一個矮小謙卑的人，全然沒有學者和大學敎授的架子。如果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一定會猜想他是一個小商人。他大約有五十餘歲，精神比少年人更健旺。發音尖勁洪亮，恰像他所寫的文字。

我和伐爾加敎授談了約二十分鐘的話，問了一些關於世界經濟恐慌的問題。隨後伐爾加敎授又介紹我見伏丁斯基（Voitinsky）敎授，他是共產黨大學的國際政治敎授，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門家。我們談了一些關於東方問題的話。這些談話大多

是關於理論方面，暫時不在這裏發表。

從共產黨大學出來，順道去參觀中央圖書館。館內藏書四百五十萬冊，比無論那一國最大的圖書館，都不算慚愧。可惜因物質缺乏的緣故，館內設備，比歐美大圖書館簡陋的多。在那一間定期刊物陳列室裏，我看到一千餘種的外國文雜誌，連英，法文的最反動的雜誌，也都和各國共產黨機關雜誌，一同放着。

巴爾幹小朋友

下午，去訪問一位中國朋友，知道他已離了莫斯科，悵然而返。在途中R女同志邀我順道去訪I同志的家。據她說：I同志是文藝新聞的主筆，蘇聯第一流的文藝批評家，尤其對於蘇聯以外的文藝界有特殊的認識與理解。他對於目前各國的無產文

學運動，有甚深的興趣。R女同志說他必樂意見我，談談中國文藝界的近情，同時我也可以從他那裏得到許多新的見識。

我們欣然地去叩I同志家的門。一位和靄可親的中年婦人，I同志的夫人，開了門，滿臉笑容地迎着我們進去。

今天眞是不湊巧，I同志恰巧於午前上車到外省公幹去了。我竟無緣見着他。留在家中的，只有他的夫人K女同志——和兩個孩子。K是R的女友，見着我非常歡喜，留我們坐下閑談，並拿出茶和糖菓，殷懃地款待着。

經R女同志的介紹後，方知道I同志夫婦都不是俄國人。他們是巴爾幹半島馬其頓民族中的革命者，在歐戰後的幾年中，爲馬其頓的民族獨立與社會革命而鬬爭，受反動勢力的壓迫，方避難來到俄國。他們和R女同志在中歐已是共過患難的朋友。七年前，他們第一次到莫斯科，那時俄國新經濟政策雖已開始，而物質情形還是十分

困難，他們因爲是外國人，找食宿都不容易。R女同志指着I夫人身旁的孩子說：

『那時這孩子還未曾出世哩。又是初到，又是像現在這樣的嚴冬，I夫人正待分娩，他們又沒有一個錢。初來時是住在我們家裏。七八個人擠在一間小屋子。那時才眞是艱難的時候啊。和前天你初到那一天的情形相比眞困難的多呢。K女同志，你還記着嗎，那樣困苦的日子？比起那時候，現在我們眞如同進了天堂呢。是不是？』

『是啊！』K女同志接着說：『現在時光容易過了。革命的最艱困的時期已成過去的惡夢了。現在我們是過着生平最美滿的日子。而且是過最合理的、公平的生活。回想起從前在布爾喬國家裏，不知道是怎樣活的。現在我們已沒有發慮。只是I年紀大了，因爲工作太多，近年頗多病，我就爲了這一件事不安心着。』

K女同志是個諷刺畫家，常在各國革命刊物上發表她的作品，大部分是描寫新俄勞動者的生活的。美國的"New Masses"上面也常有她的諷刺畫通信。她拿出

許多畫稿和從雜誌報章上剪下的諷刺畫指示給我看，都是具有明顯的革命意識而有力量的作品。她不僅是一個女革命者，而且是一個卓特的無產藝術家。

I家有兩個孩子，一個就是上面R女同志說過，在他們初到莫斯科那一年出世的，現在有六歲了。還有一個略大一二歲，據說是保加利亞革命者的兒子，他的母親早死了。父親在蘇菲亞（Sofia）監獄裏。留着這個革命種子，由K女同志撫養着。這兩個孩子看到我親切極了。因為他們天天從家庭裏、學校裏、少年讀物裏知道了一些熱烈的中國革命，但是見到中國人還是第一次。他們一個爬到我身上，捧住我的頸子，一個抱住我的膝蓋，用德國話爭着要我講中國故事，向我要中國糖菓，中國畫片。我從衣袋角裏掏出在柏林買的幾粒剩餘的朱古力，只說是從中國帶來的，送給他們，他們就歡喜得手舞足蹈，爭着要我吻他們的蘋菓般的小腮兒。他們向我講了許多的話，因為語言不通，雖然由R女同志翻譯，也仍是很困難，可是孩子們的天真的熱情，不覺引出了

我的滿眶的熱淚。孩子們本來就沒有國家民族的界限，對遠方客人也和隣人一般；尤其是無產者的孩子，尤其是這革命者的孩子！

待我們起身要去時，這二位異國的「小同志」一各人抱住我的一隻腿，無論如何不放我走，要我永遠住在他們家裏。後來經K女同志再三解釋，說我明天早晨還要再來，並且帶了中國畫片送給他們。這樣我總算突破了重圍。出門時那兩位巴爾幹的小友，握緊左手的小拳頭，向上舉起，嚷着：「Rote Front!」我心中起着生平少有的波動。

「蘇維埃的孩子的熱情你領受過了罷？」走到街上時R女同志向我說。

我默然。因爲當感情過分洶湧時，言語是被窒塞了。

在回到福金街去的電車裏，R女同志敘述她自己的歷史。她說『我生平經過無數憂傷患難，在十年前我萬想不到我還能親見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我能過這樣幸福的日子！』

原來R女同志是匈牙利人。在大戰前，她是一個匈牙利的世界語運動者。在當時托爾斯泰一派的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的思想，風靡全歐洲，她是受了這影響而學世界語的。她在匈牙利京城布達佩斯德創辦了當時著名的世界語刊物。她對於世界語文字的精通，在當時匈牙利是數一數二的。後來因爲加入了政治社會運動，便漸漸把世界語的工作拋棄了。

一九一五年，大戰進行的時期，他和他的丈夫R同志加入了社會黨國際中的反對戰爭派，即布爾希維克。當時的領袖列寧，托洛斯基還流亡在西歐。俄國革命後，中歐一帶革命達到了最高潮，結果在佩拉昆（Bela Kun）指揮之下，產出了匈牙利蘇維

埃共和國。她的丈夫R同志便是這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郵電人民委員。這中歐唯一的蘇維埃政府，不到數月便遭傾覆。政府要人到處流亡。R同志夫婦改換了姓名，假扮歐戰時俄國俘虜，由萬國紅十字會送往俄國。但R夫婦不曾到過俄國，又不能說俄國話，還帶着三四個孩子，混在俄國俘虜隊裏，一不小心便會露出馬脚。這一路困難可想而知。這樣的僥倖到了莫斯科。到莫斯科時雖然已出了險，但俄國話不能講，俄國情形不明瞭。他們雖然是布爾希維克黨員，但一切證據在路上已完全毀滅，無從證明。虧了佩拉昆和伏爾加教授認識他們，向莫斯科當局代爲證明他們一家方在莫斯科住下了。

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後來R同志因和R女同志個人感情不合，獨自回到中歐仍去做革命工作。R女同志則在莫斯科中央郵局做工，並看護小孩。

因爲她是老黨員，所以在郵局佔重要地位，郵局職員也都愛重她。她幾次想脫離

郵局職務，未得許可。這次陪了我在莫斯科走了幾天，她更覺得郵局工作太枯燥，想把生活變換一下。因此又向郵局提出辭職。到我離開莫斯科的前一天，她和我說，已得了辭職的准許。以後她想到鄉間去做農村文化工作，因爲她最愛和農民在一處。但因爲他的大兒子還未在莫斯科學校畢業，所以一時還不能到鄉村裏去。她暫時想在無線電大學（用無線電授課的）任職員，或在一家少年日報當編輯。

在我寫此文前數天，接得一個可驚消息：R同志從國外乘飛機回莫斯科，在半途飛機跌墜死了。我想R女同志一定非常悲痛。我在這裏附帶表示我的同情與敬意。

紡織工廠

一月三十一日早晨，U同志陪伴着參觀Trehgornaja紡織工廠。R女同志也去

參觀。

Trehgornaja紡織廠本是大戰前一個私人所有的舊工廠（現在是國立工廠），只有一部分是新建的，而且不能算作莫斯科的最大的工廠。但因U同志本是紡織工人，他懂得紡織業的專門技術，而且又和這個工廠管理人相識，比較方便，所以介紹了我們去參觀。這工廠有三千餘工人。裏面工作分紡紗、機織、染色、發動機等許多部分。設備和上海的大紗廠不相上下。最使我驚異的，是廠內衞生設備的完全。因爲平常紗廠內——尤其是梴子間——空氣往往非常窒塞。上海的紗廠工場，裏面汚濁的如同人間地獄，自然不必說。就是我在倫敦、不魯捨拉、盎凡爾所見過的工場，也收拾得不甚清潔。但是在這紡織工場內，我停留了三小時，各部分都去看過，空氣和在平常家宅一般淸潔。雖在寒冬門窗緊閉，因有通風洞的裝置，工場內部全無化學藥品的氣息。地上不見塵埃。機器陳列的都有次序，而且留着很大的空隙，供人休息行走。這是平常工場內

所不易見到的據說蘇聯工場對於衛生設備，非常注意，雖費了很多的錢，亦所不恤。

工人工作時間，分為兩種：熟練工人，每天工作七點鐘，中間包含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不熟練工人每天工作七點半鐘，除去了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外，實在工作仍只有七點鐘。此工廠已採用不間斷工作制，機器永遠開動着，工人日夜分三班輪流工作。每工作四天，分班休息一天。

在錠車間內，每一工人管四架錠車。這工作非常簡單，不需要熟練的技術。我問這工場內的一個女工，賺多少工資，她說每月是七十盧布，這是全廠最低的工資率。連同一切的補助工資（卽疾病保險、保產金等）計算在內，和戰前的工資比較，是增加了一倍多。

廠內有育兒所，專備女工進廠工作時寄放嬰孩之用，雇有保姆看護，工人進廠，把孩子寄託，工作完畢時仍帶着回家。工人幾乎全部都在工廠內進膳。共有兩個食堂：一

個在工場內部地方不甚大，單備熱水、茶、麵包、糖菓、點心，備工人於工作中間隨時取用茶點。另在工場外面新建一個大食堂，則爲工人進膳之所。這食堂可容四千人，收拾的甚爲清潔整齊。食堂內有大講台。食畢卽可改作大會場。食品定價很便宜。平常一餐一湯、一肉、一點心，連茶和麵包只費三十五個戈貝。比在無產旅行社的食品價目，又便宜多了。

工廠附設藝徒學校，學生是未滿二十歲的青年工人，每天除在工場作五六點鐘的工以外，便學習工作技術兩點鐘，和普通工人一樣領取工資。

在染色工場和一個工人談話，知道他是在莫斯科大學念書的。他對於工作已有豐富的智識與經驗，所以管着重要的工事。他和我說對於這樣的生活，非常滿意。他每天做七點鐘的工，在大學上三四點鐘的課，又因他擔任着許多社會的文化的工作，每天爲了開會，演說，辯論，又費去三四點鐘。這樣除了睡覺以外，簡直沒有一分鐘的休息。

可是看他的樣子似乎並不覺疲勞。在蘇聯許多黨的青年分子，生活大概都是如此。

我問他們工廠內管理權操在誰的手中。他們說關於技術部分的事，有工程師技師計劃管理。工廠主任則由政府委任，但工人代表所組成的工廠委員會，有建議及監察權。主任須受工廠委員會的監督。關於雇用或辭退工人，及工資等由工廠委員會決定。工廠主任不稱職時，工廠委員會隨時可請政府撤換。所以實際上，工廠管理權，除技術的部分外，全在工人代表之手。主任亦幾乎無例外地是工人出身，而在黨內有地位的。因有工廠委員會的嚴密監督，所以管理人營私舞弊，或官僚化的事，不易發生。據說，革命初年，因從工人出身的工廠主任，往往欠缺技術智識，以致把工廠事務弄的很糟。後來把這些不勝任的管理人，送到大學工科補習數年，此種困難，方纔逐漸減少。各工廠主任，因爲大部分是黨員，所以比普通工人更爲勞苦，往往整日夜不停地工作。有許多主任同時還在大學校裏上課。

在工場外面一塊空地的角上，豎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俄文字，據說意思是「黑角」。這「黑角」是爲了懲罰怠惰的工人用的，在這指定的一片土地上，插着十餘個木製的平面影像。有的抱着一個大酒瓶；有的昏沉沉地睡着，有的像一個小偷的模樣，有的張着大口吹法螺，種種醜態，不一而足。每個影像上都寫着人名和所犯的事由。據說，凡工人，有雞竊及偷盜情事，或工作怠惰，不能實踐自己約定的工作標準的，經工人代表所組織的法庭判決，方在「黑角」內陳列示辱。其情節較重的，工人法庭可加以罰金或開除的處分。但一切懲罰，都由工人團體解決，工廠管理人不加干涉。

在工場內部牆上，釘着許多破壞的機件，拏碎切斷的紗線和布匹，旁邊都寫着幾行俄文。我當初不知道是什麼，問了他們，方知道是一部分工人因作工時不當心，毀壞了機件或紗線、布匹，於是把這被毀壞的東西釘在牆上，旁邊寫着毀壞者的姓名，損失的數目，當作一種警告。這些都是維持工作紀律的方法。蘇聯的工人把工作紀律看的

很重，違犯紀律的，必由工人共同加以懲罰。因爲在蘇聯工人是爲大衆而生產，不是爲少數人贏利而生產。若不守工作紀律而使生產損失，卽是對於大衆的損害，是非懲罰不可的。

另有一種懲罰方法，更有趣味。自從採行五年計畫以來，蘇聯政府頒行一種新式「勳章」，名叫「奧勃洛馬夫章」。奧勃洛馬夫（Oblomov）是十九世紀俄國著名諷刺作家岡却洛甫（Gontcharov）的小說中的主人公，是描寫一個缺乏意志而游惰不做事的青年，是對於當時俄國的頹廢青年的一種諷刺。這小說在俄國流行的很廣。因此在社會主義的競爭中，勞動者當初加入了競賽自己約定生產的某種標準，而到了限期却不能履行時，便送給他這樣一個勳章，罰他必須把這奧勃洛馬夫章時常佩在胸口。這樣的懲罰，簡直成爲一種有趣的惡謔了。

在工廠門口，看到了蘇維埃選舉的候選人名榜。原來這幾天正待舉行莫斯科市

蘇維埃選舉。在選舉以前，照例把各工廠各候選人名單揭貼在工廠門口，在未選舉以前，工人如對於名單上所開列的候選人，有認為不滿意的，可提出檢舉，取銷其候選人資格。這 Trehgornaja 工廠的候選人有十餘個。U同志說，這些候選人幾乎全是紡織工人。其中有一個是從前這工廠裏的工人，因幹革命工作，在芬蘭被捕，監禁已數年。現在把他列作候選人之一，乃是表示工人們對於這位革命同志的敬意。

穀麥托辣斯

午後參觀 Zernotrust 即穀麥托辣斯。這裏是國營農場的總管理機關，規模很大，聘用許多美國專家和顧問，計畫農業集團化的經營及發展。我見了這裏的主任，問他國營農場的情形，因此知道了蘇聯農業經濟政策的梗概。我對於蘇聯農業改造計

書，甚感興味，到莫斯科時，就想往農村去看一下。但因爲天氣太冷，我不曾帶得禦寒的皮衣服，在城內已經忍受不住，到鄉間會凍出病來。而且據他們說，這時候田莊全被雪掩蓋着，一切田野工作完全停頓，即使到了農村裏，也看不見什麼東西，所以終於沒有去，單在穀麥托辣斯裏詢問了一些關於農業集團化的實施情形。

說到農業集團化，國內似乎還少有人注意。依我個人看來，這是布爾希維克革命的最大胆的工作，這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最猛烈的進攻。十月革命是震動全世界的一件大事，但在我看來，一九二九——三〇年蘇聯的農業集團化運動，意義和十月革命一樣重大，因爲這是摧毀了蘇聯國內資本主義的最後壁壘富農的逐漸消滅，是表示社會主義戰線的最大勝利。雖然農業集團化現在還未做到完全成功，但這樣的大膽嘗試，已經是值得我們的深切的注意了。

原來土地問題，農政政策，爲蘇聯革命的最大難關。蘇聯共產黨的領導者們，爲了

這問題，曾引起嚴重的意見衝突。依目前的情勢，是斯太林的政策得了勝利。我們都知道十月革命後把土地從地主手裏收歸國有，重行分給農民耕種。但因爲農民都帶着小資產階級的根性，他們分得耕地後，仍把所耕的土地，看作自己的私產，不願把耕種所得的食糧，除自己食用以外，提供給政府。政府不得已，向農民强制徵發糧食，農民仍頑强抵抗。結果，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農業生產，驟然低落。都市勞動者，糧食供給，異常缺乏，全國陷於大饑荒。因此到一九二一年，政府採行新經濟政策，暫時對農民讓步，許農民買賣土地，僱傭農工。這新經濟政策的結果，到了一九二八年，蘇聯的農業生產逐漸回復到大戰前的平準。不但都市糧食供給，不再起恐慌，而且可以用剩餘的穀麥，輸出到國外。

但這到底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因新經濟政策的結果，政府對農民加以放任，於是在農村，富農階級如春草怒長。向來自有家宅、牲畜、農具的大農中農，兼併小農的土

地，雇傭貧農耕種，成爲變相的地主。這富農階級的產生，使社會主義的實現，遇到極大的障害。不但如此，俄國耕地向來是小農制，耕種技術甚爲幼稚。爲增加農業生產起見，非行農業機械化、電氣化不可，而機械化、電氣化必須先把土地集中，開成廣大的農場。在土地依然私有的形勢下，大農場的建設，實爲不可能。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五年計畫開始實行的時期，政府採斷然的處置，實行農業集團化計畫以根本解決農業問題。所謂集團化就是把私人經營的土地收回，改由 Sovkhoz （蘇維埃農場或稱國營農場）及 Kolkhoz （合作農場）經營。在蘇維埃農場及合作農場內，房屋、牲畜、農具、耕種汽車都歸公有。收穫的農產物，亦歸公有。農民歸農場雇傭，發給工資，與都市工人同一待遇。這些國營農場和合作農場，有一個別號叫「穀麥工廠」。因爲這些農場，完全採集中分工組織。耕種面積可以大到一千餘公畝，每一農場往往備着數千架的耕田汽車。一切耕種收穫全用機械，由專家及工程師集中指揮。其性質與都市內的工廠完

全無異。這樣便把農業的特質完全消滅，農業勞動者依着規定工作時間，在田野工作，按時領取工資，亦與都市勞動者完全相同。這農業工業化的計畫，把農村與都市的差別性取消，把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性克服，使資本主義失却最後的立脚點，不用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中的一個最大膽的嘗試。至於因農業集團化的結果，得以擴大耕地面積，儘量利用科學技術，以增加生產率，這更是非常明顯的。

自然，這大膽的嘗試，斷不是一無困難的。自一九二九年以來，蘇聯的農民集團化，以高速度進行，中間因、富農及農村反動分子的頑强抵抗，受了極大的犧牲。一般富農往往屠殺牲畜，焚燒房屋，暗殺黨員，以阻礙集團化的進行，這中間經過許多次惡鬥，和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間的國內戰爭，同樣的嚴重。但就最近所報告的結果，政府的政策，終於得到了勝利。在一九三〇年五年計畫第二年度終了，全國耕地集團化的已佔百分之二一·五，在產麥區域，集團化的耕地佔百分之四三·八，在北高加索則佔

百分之六十。這數目已超過五年計畫所預定最後一年的數目。全國農民的百分之二一·五，即五百餘萬人加入合作農場。全國所有耕種汽車，達七萬三千架，共有一百零二萬二千六百零二馬力。列甯說過的，俄國有了十萬架的耕種汽車，社會主義可以完全實現。現在和這數目已經差的不多了。

這農業集團化的成功，據說不單是靠了農村的黨員的努力工作，有一部分還是靠了都市勞動者的協助。民衆全體把農業改造看作一件大事。許多黨內重要人物和黨外智識分子都到農村裏幫助農民經營合作農場，並勸誘農民加入。春天播種，秋天收割的時候，都市的電氣機械工人都到蘇維埃農場、合作農場，去幫同工作，開駛和修理耕種汽車。大學教授和科學家全體動員，到農場去作農事講演。新聞記者去到農村編印臨時刊物。會計員去帮助農民整理帳目。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少年先驅都到農村幹文化宣傳工作。甚至莫斯科大戲院的第一等名角也都離開都市，到鄉村中輪流演

劇，慰勞那些在田野工作的農業勞動者。我去莫斯科的時候，是在農村收割以後，播種以前，不曾親見到那種舉國若狂的氣概，但單就他們的口述，已可見蘇聯對農業集團化的重視。因爲在他們看來，目前世界無論何國，農村衰落，農民經濟困難，農村與都市失調，成爲不可挽回的危局，惟有蘇聯的農業社會主義化，爲全世界農民開闢一條新路，爲農民經濟的唯一轉機，所以他們不恤以全力幹去。

克列姆林

莫斯科這個城市，第一次見於歷史紀載，還不過是八百年前的事。但到了十四世紀初年，莫斯科已成爲東西行旅的要道，部族征戰的重鎭。東方蒙古的游獵部落，西方大俄羅斯、立陶宛的封建貴族，都在這大平原上殺來殺去。一三〇〇年，俄羅斯人的祖

先，在莫斯克伐河（Moskva）左岸小山上用泥土木料，建造了一個堡壘，預備給各地避兵禍的難民在這裏躲掩。這堡壘後來就叫克列姆林。（Kreml或Kremlin）「克列姆林」在俄文便是城砦堡壘的意思。後來莫斯科城市逐漸擴大，克列姆林也經數次改建，成爲城市守衛的中心。一九一二年，拿破崙大帝佔領莫斯科，曾在克列姆林設起寶座，可是不到幾天，便被俄羅斯農民趕跑。想不到這八百年來酋長、貴族、帝王、教會爭戰掠奪的城砦，却成了普羅列太里亞的統治中心，世界革命的大本營。歷史便是這樣地開着玩笑的啊！

現在的克列姆林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聯邦政府和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的所在地，所以警衛非常森嚴，平常人是不容易有機會進去。我因了V.O.K.S.的介紹，方得進去看看舊俄皇教堂博物館。同去的還有一對美國人夫婦。我們在大門口等候的很久。看着那些進裏面去的，都是長着滿臉大鬍子，著着襤褸不堪的舊

皮外套，腿上染滿泥土的大漢，據說都是從高加索、克里米亞、濱海省等遠處來的農民代表或工人代表。在別的國家裏，這些人連進縣知事衙門裏去都要被攆走的，現在卻可以在全蘇維埃聯邦的中央政府裏自由出入。反之，我在倫敦的唐寧街（首相府所在地，巴黎的 Palais Royal（國務院所在地）一帶所看見坐着汽車進出，穿戴着燕尾服大禮帽的「紳士先生」們，却沒有權利進克列姆林了。

克列姆林是一個五角形的城砦，面積大約有一百英畝，高據莫斯科城市的中心。週圍建築着磚石砌成的高城牆，繞城約有中國四五里路。共有五座城門（但平時只有一門開着），每座城門上面都有一座城樓，高可望見莫斯科全市。五座城樓全是著名的古建築物。克列姆林裏面最著名的是幾所大教堂。其中最古的是東方式建築的烏斯賓斯奇大教堂（Uspenskiy Cathedral），為前俄皇、俄國總主教、莫斯科主教登位之地。又勃拉哥維斯千克大教堂（Blagoyyeschensk Cathedral）則為俄皇作

禮拜並行大婚典禮的教堂，藏有名畫甚多。希臘正教向爲俄國國教，其歷代寶器及總主教墓，都在這城牆之內。所以克列姆林向爲俄國聖地，革命以前，進克列姆林城門，須一律脫帽，和紫禁城下馬一樣的情形。現在已把一部分的宮殿教堂改爲博物館。我去參觀時，有兩個教堂內部，正在搭着高架從事修理。據說爲了留作後代的參考紀念，政府對於這些宗教遺蹟，不但不去毀壞，而且還費了許多錢，去修理保存。

在西歐的時候，常聽到教會的宣傳，說蘇聯對於宗教盡力摧殘。許多教堂都被拆毀，教士被槍殺，去年羅馬教皇還居然爲了此事提出抗議，檄告全世界，大有欲重興神聖戰爭之意。據我在莫斯科所見，許多教堂還開着。不過到教堂去作禮拜的，只有那些老婦人，青年人是沒有一個進教堂去了。有的教堂因爲再沒有人去作禱告，經附近的工會決定，改設工人俱樂部或學校，這是事實。但說把一切教堂都拆毀，以目前蘇聯之居屋缺乏，布爾希維克黨決不如此傻氣。至於教會財產歸爲國有，教士不能不勞動而

得食這也是事實。但宗教信仰依然許人民自由，政府並不干涉。不過革命後的青年受新式學校教育和文化宣傳的影響，都已變了無神論者。「神聖俄羅斯」的招牌是已不能再掛上了。

列甯墓

從克列姆林出來，便去看列甯墓。列甯墓背靠着克列姆林城牆，前面就是每年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節舉行勞動者大示威的有名歷史紀念地紅場。

在我的想像中，以為列甯墓應該是一座巍峨的建築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的領導者，應該埋葬在像麥加的囘教堂那樣鉅大的殿堂裏，至少也應有像巴黎Invalides內拿破崙墓那樣的規模，方纔可供全世界平民大衆的憑弔。但我走到紅場前面時，便

大大地失望。原來這列甯墓不過是一座低矮的構成派的建築物。外表頗和巴黎國葬院（Pantheon）相類似但只有四分之一的高大，彫飾和一切蘇聯新建築物相同，是非常單純。和墓後的克列姆林城牆，左旁的高大而華麗的城樓相比較，更顯出這建築物的謙卑。不過整個的氣概，却是雄壯而樸素。墓的前門寬不過二三尺。來參觀的人在門前排着單人的隊伍，魚貫而入。進了門便向左轉灣，踏着磁磚砌成的石階，走下墓道，正中便是棺木。棺木下層是銅製的，上層是一個玻璃罩。列甯的遺骸露出半身。頸部和右臂靠在枕上和被上。玻璃罩內面有反光鏡的裝置，所以狀貌看的很清楚。觀衆繞着足前經過，全屋靜寂無聲。隨後從右旁偏門走出門外。據說，每天列甯墓開放的時間，參觀的人是和流水般來往不絕的。

墓門上面砌着列甯的名字。墓內却沒有半個字，連一切圖畫彫刻的裝飾全沒有。

我是在巴黎所演的電影裏第一次看見過列甯。他從辦公處緩步出外，頭戴着工

人小帽，右手夾着一個皮夾，一邊在和一個老年的教授談話。使我吃驚的是他那種謙卑的模樣。身軀和腿比常人短小。但廣闊的肩頭，高聳的額部，英銳的目光，顯出他是一個非常的人。這次看到他的遺骸，使我也有同樣的印象，只是兩眼半閉着，已經不能反射出銳利沉着的光芒了。

列甯墓兩旁，數十丈長的石階，據說下面是埋葬着數百革命的獻身者的遺骸。但現在是被一尺餘厚的白雪掩蓋着，看不出一些蹤跡。

在蘇維埃國家，英雄主義與個人崇拜是不存在了。但階級鬭爭的戰士，仍然有着他們的「不朽！」

午後六時，到福金街六號的聯絡工人俱樂部，因爲莫斯科世界語同志在這裏招集會議，特意邀我去出席這俱樂部是一所三層樓的很精緻的建築，屋內裝飾非常華麗。在革命以前是一個著名大茶商的第宅。這茶商是以輸入中國茶致富的。據說李鴻章聘俄時，應茶商之請，也曾到過這屋子。革命後由政府沒收，改作聯絡工人（卽郵政、電報、電話、無線電職工）俱樂部。內部設備很完全。有圖書館、音樂室、體育室、補習學校等。更有兒童游戲室，備着小桌小凳，一切玩具，職工們來俱樂部的時候，便把小孩在這裏暫時寄託。

因去的時候還早，俱樂部的大會議廳裏，正在舉行家庭蘇維埃婦女代表選舉。世界語同志們便介紹了我和另一位意大利世界語者同到選舉的會場裏去旁聽。

在蘇聯，選舉不但是產出勞動者代表的一種過程，而且是訓練民衆的一種方法；所以不用議會政治國家所習用的個別的秘密投票制，而用集團的公開選舉制。如前

節所述在選舉期前，各處推出候選人，將名單張貼公共處所。到了選舉的時期，五百人以上的工廠或機關裏，勞動者各在其工廠或機關內開選舉會。人數未滿五百的工作機關，則就附近地段合併二個或數個工作機關，開選舉會。其餘自由職業者則集合各個同業者開選舉會。連日莫斯科舉行市蘇維埃選舉，我在街上看到許多選舉人的隊伍，前面用樂隊引導，整隊行走，拿着標幟，喊着口號。據說這些都是未滿五百人的工作機關職員或自由職業者，排隊前去參加選舉會的。

我在聯絡工人俱樂部所看到的，是家庭婦女的選舉會。在蘇聯只有體力勞動者與精神勞動者有蘇維埃代表的選舉權。但勞動者的妻，因爲撫育兒女，家庭工作過繁，不能到工廠作工的，也同樣享有選舉權。

走進了會場，裏面第一使我驚奇的，是那選舉會場的佈置。這會場是前茶商第宅中的一個跳舞廳。在一端建造了一個大主席台。主席台上和兩旁懸掛着數尺方的大

字；和兩個用木板彫成的巨人用電光配合恰如新派的戲台佈景。滿場都是彩色的電燈。兩旁樓廂上排列着音樂隊。這是何等壯麗輝煌的排場。主席台下面一排排整齊地坐着的却盡是從三十歲到五六十歲的中老年「管家婆」。她們一個個都瞪着眼，向着主席台上靜聽。這些家庭婦女因年齡環境的關係，對於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比較地不大習慣，但就外表看來，似乎她們對於每一段演說，每一個決議，都非常留神，而且很感興味。

選舉會開始時，照例是各種報告，接着是候選人演說，宣布各人的主張。會場中有幾個人起立向候選人詰問，候選人都加以答辯。演說完畢後，舉行選舉。選舉是用舉手法，每提一個候選人時，贊成的一律舉手。最後以舉手最多的當選。每次一個代表選出時，樂隊便奏國際歌，全場歡呼。

當主席發見我們在旁聽時，便要求我上去說幾句話。這些列席的家庭婦女，見一

個黃臉孔的人走上台來，都大聲高呼。我接着說了賀辭。場中有個比較年輕的女子起立問我，說上海紗廠女工每天做十二點鐘工作，在中國農村裏婦女被翁姑丈夫隨時毆打欺侮，是不是事實。這一問使我十二分難受。

實在的，每天十二點鐘的勞動，在蘇維埃的婦女已經是不能想像了。現在她們的政治、經濟、社會、家庭的平等地位，已有了確切的保障，所以雖然在不久以前，她們也受過類似的屈辱，却已不再記憶了。

世界語者的招待會

世界語同志的招待會開始，已經是晚上八點了。和我同時被邀請的，更有一個意大利的金屬工人，他因受了白色迫害，到美國避難，後來又從美洲來蘇維埃國土。到莫

斯科已有一個多月，略能講世界語。我問他在這裏的感想如何，他說是以前意想不到的滿意。他打算在蘇維埃任下，進金屬工廠作工。

我向莫斯科世界語同志表示了懇切的謝意，接着報告了去年在倫敦出席S.A.T.大會的情形。列席的莫斯科世界語者，似乎都非常關心國際工人世界語運動，雖然關於俄國以外的世界語運動，他們都不易得到正確的消息。末後，D同志代表蘇聯世界語同盟莫斯科分會向我致辭，大旨是說目前蘇聯與中國國交雖尚未恢復，但這兩大民族的命運是聯結在一起的，不久必能重新攜手。這兩大民族共有六萬萬的人口，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陸地，一日聯台起來，世界平和方有保障。而使這兩個民族聯合，國際公用語Esperanto實是唯一必需的橋樑。

直到午後，聯絡工人俱樂部的集會，方纔盡歡而散。

阿摩汽車工廠

二月二日上午到職業工會總部訪J同志，因爲昨晚在聯絡工人俱樂部和他約定同去參觀阿摩汽車工廠。職業工會總部是莫斯科著名大建築之一，係由俄皇時代貴冑學校改建的。工會內部規模很大，有會議所、俱樂部、大食堂、各部辦公室，可惜時間太短，不能逐一去參觀。工會總部房屋的一部分是無線電台辦公處，J同志便在裏面辦事。有許多美國英國人，被雇用在此處服務。他們都很熱誠地用英語和我談話。J同志是世界語運動初期的傳播者之一。據他自己說盲詩人愛羅先珂的世界語是由他教授的。近來他很熱心於無線電事業。自信無線電播音，爲提高勞動者智識文化的唯一利器，所以在工人中間，主張竭力宣導，使每個工人都具有關於無線電的常識，了解

收音機裝置修理的技術。

在職業工會總部午膳後，便坐着電車向近郊出發。同去的除J同志以外，有U同志，昨晚在世界語集會中遇見的意大利人以及同住在無產者旅行社曾到過美國的那機器工人。

坐了約一點鐘的電車，我們方到了阿摩（Amo）汽車工廠。這完全是一所新建的工廠，一切機械設備，都是近代式的。在革命以前，俄國不能自造汽車。以前在莫斯科近郊只有一所汽車修理工廠，由私人經營，工人不過百餘。革命後，因全國交通事業發展，汽車需要量激增，同時因農業機械化、集團化之故，需要大量的耕田汽車。雖然每年從美國輸入大批的摩托車，仍不夠用。五年計畫中，規定建造大規模的汽車工廠數所，阿摩工廠便是其中的一個。這工廠最初是就原有汽車修理工廠改建。但現在擴充的很大。全廠有二十餘所的大工場，全是新建的，舊廠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改作材料堆積

間。雇用工人去年還只四千人，現在已增至一萬人，到今年年底因有數部分新廠落成，將增至一萬五千人。

這麼一個大工廠，單是巡視一週，也決不是半天內所能完事。所以廠中的引導員問我願意參觀那一部分。我說，對於機械工程，我是門外漢，實在無參觀必要，我所希望參觀的，是一切關於工人生活的設備。於是他們立刻引導着去參觀食堂、廚房、浴室、游泳池、補助學校、託兒所、赤色救濟會、洗衣房等處。也只匆匆地看了一下，已經是黃昏時分了，我們方總回到莫斯科市內。

工廠生活

社會主義的最後理想，是要使勞動的場所，成爲人類活動的本位。人類自脫離原

始共產主義的社會以後，便以家庭爲生活本位。在農業社會中，家庭不但爲食宿之所，而且爲勞動娛樂教育之所。人在家庭的小天下中生長老死，和社會生活不相接觸，因而養成自私貪鄙、人與人互相掠奪的習性。到了產業革命以後，家庭工業崩壞，都市大規模工廠出現。工廠逐成爲出賣勞力的場所，除勞動以外，全部生活仍在家庭以內。因勞動者經濟的困苦，家庭生活不能給與一種慰安；而專以剝取剩餘勞動爲目的的工場，在勞動者又視爲人間地獄，無情趣可言，這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慘劇。在蘇聯，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雖還未免過早，但却是向着這方向走去，其最顯著的事實，即勞動者逐漸脫離家庭生活而以工廠爲生活的大本營。從前工廠只是勞動的場所，而現在逐漸成爲飲食、休息、娛樂、教育、養育兒女乃至一切人類活動的場所。至於家庭則已縮小到成爲單供睡眠的地方。除了睡眠以外的時間，幾乎全部消耗在工廠裏面。在工廠裏除七小時的工作以後，一切娛樂、教育、飲食，全體工人都營着共同的生活。這樣人類生

活方纔趨向於集團化、社會化。從前關閉在各個家庭的小天下之內所造成的自私、貪鄙、佔有、妒忌的習性可以逐漸消失。這是到社會主義的唯一捷徑。

我不敢相信蘇聯一切工廠內部工人生活的設施，都非常完備，時間上、經濟上的困難是應該原諒的。但至少像阿摩廠那樣的幾個模範新工廠，却已頗接近理想的境地了。阿摩廠有一萬個工人。對於這一萬個工人，阿摩工廠就代替了他們的家庭。他們每天清早進廠，除在工場內做七小時的工作以外，就在廠內的食堂進餐，在廠內的俱樂部、會議廳、娛樂集會，在廠內的補習學校、圖書館補習，乃至洗衣、游泳、運動、閱報、交際、療病、育兒，全在工廠內部。他們的孩子於每日清晨帶到廠內的託兒所，直到晚間方一同回去睡覺。不用說，這樣的集團的生活於勞動者心理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們先去參觀了食堂。這食堂比我在莫斯科所見過的都廣大。大約有二千多人的座位。四個和六個人坐在一個桌子。每張桌上都放着一個花瓶，插着幾朵紙花（因

為在這時候得不到鮮花。）佈置的井井有條。要不是四壁都張貼着赤色的標語和宣傳圖畫，簡直和平常布爾喬大飯館內的陳式沒有什麼兩樣。食堂的一端是長櫃，來這裏進餐的都在櫃上先買了飯票每全餐一湯、一肉、一點心連麵包、茶，收費三十戈貝。菜是由食堂的辦事員（大多是十餘歲的孩子）端送到座上。食堂的另一端，有着一座大講台是開會時用的。我們去參觀的時候，午餐已經完畢，正在舉行蘇維埃選舉候選者的演說，有一部份工人在聽着。

食堂的旁邊便是廚房，我從來沒見過這樣大規模的廚房。據說這廚房每兩小時內可供給六千份的全餐。一切設備全是用新式的電氣裝置。湯是用蒸汽大鍋燒的，糕餅是汽爐蒸的。甚至馬鈴薯也是用機器來去皮，據說這去皮的機器，還是新近一個廚房工人發明的。廚房的工作，完全用分工制，例如專管馬鈴薯去皮的就有女工十餘人。另有一個極大的冷氣間，藏着宰死的牛三十餘頭，猪羊各十餘頭，據說可在這裏貯藏

二三個月，肉味不會變壞。

廠內有工人補習學校，是連接三四十間的教室，教室佈置和平常學校一樣完備。每一教室內有四五十人至百餘人的座位。所授科目據說是非常繁多，工程技術、無線電、外國語（特別是德語英語）、社會科學、會計學，一切都有。依工人的志願，隨時添設或裁併。有許多教室，整日夜不停地開班授課，日班工人多在夜班補習，夜班工人則在日班補習。

工人浴室的佈置和上海青年會內的浴室，沒有多大差別，盆湯與水淋浴都有，不過地方却大的多。工人只須付數個戈貝，便可洗浴一次。離浴室不遠，是一個室內大游泳池。池水是用溫水，可容數百人。這樣大的室內游泳池，在上海沒有見過。據說另有工人體育場，因時間不夠，不會去參觀。

託兒所

我們都知道在蘇聯有公共育兒院，勞動者可以把兒女送去留養，收極低廉的費用，甚至完全免費。但大部分的母親却不願意和她們最親愛的孩子們分離，一方面則自己又須到工廠做工。爲了這些母親的方便，所以工廠內有託兒所的設置。這些託兒所的設備，和公共育兒院差不多，不過孩子們不在裏面過宿。每天母親進工廠的時候，便把兒女帶到託兒所裏（但八歲以上的送進學校去），直到晚間出工廠時，方把兒女領回。所以在蘇聯，勞動者的孩子們不再在家庭中長大，實際上是在託兒所內養育的。從脫離母胎起，他們便和他們的同等年齡的小朋友們，一塊兒生活，一塊兒游戲，一塊兒受敎育。這樣，人從在襁褓裏的時候起，已習慣於社會生活了。

「阿摩汽車工廠有兩個託兒所。一個是嬰孩保育室，專收未滿四歲的嬰孩。另一個是幼稚園，收着四歲到八歲的孩子。我們先去看了嬰孩保育室。進門處是一間嬰孩存放室，備着一張特製的大圓桌，周圍有着遮欄。嬰孩送來時暫放在桌上。嬰孩又依年齡的不同而分列在各個特別的房間。裏面放着許多小搖床。另外有游戲室、哺乳室等。室內放着小桌、小椅、小床、小磁盆等，都是爲着嬰孩們特製的。內部非常整潔，無纖塵，室內參觀，須脫了靴方能進去。嬰孩們由許多女醫生和保姆料理看管。我們會見了那位管理主任，是一位女醫生。她和我們談了許多內部情形和辦事上的困難。她說：『我們爲了克服一般母親們的無知，費去很大的心力。勞動婦女們不幸大多是缺乏智識者。他們還保持從前的舊習慣，無論如何，總不放心把自己親生兒女寄託在別人手中。她們又往往缺乏科學常識，對於託兒所用科學方法養育兒童，總是帶着懷疑的態度。我們有時爲了極細小的事情，都用很大的努力，對母親們解釋宣傳，方能逐漸博得她們

的信仰。』可見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單是嬰孩公育，都有着許多的困難。

幼稚園的設備也和保育室差不多。不過在那裏，孩子們的年齡大些了，在練習着各種手工、圖畫、學習文字、數學等。但都是兒童自動地工作，保姆只在旁指導着。在那間工作室壁上寫着列寧的一句話：『愛你的朋友們！』還懸掛着壁報，登的盡是兒童作品，有許多兒童所作的繪畫，特別天眞有趣。

託兒所的主任要我在他們的來賓參觀簿上寫幾行文字，以作紀念。我提起筆欣然地寫着：

『我慶賀着這些在自由平和的空氣中生長而不知人世憂患的蘇聯的勞動者的孩子們。會見了這些天眞可愛的小朋友們，我對於人類的後代的幸福，纔有了確信了。』

當我們走出門時，J同志說，孩子們在歡送我們呢。我回過頭一看，果然，大門旁玻

璃窗內，一羣五六歲的孩子們在向着我們舉手歡呼！

參觀了託兒所以後，去看了廠內的赤色救濟會辦事處。最後又去會見廠內工人日報的總編輯。這日報每天出一單張，銷售九千份，是專供給阿摩廠工人閱看的。我們和那位總編輯交換了一些談話，那位總編輯問了我許多關於西歐及中國工人生活的情形，他說要把這段談話在第二天日報上發表。

大戲院的跳舞劇

雖然對於戲劇，我是門外漢，但新俄羅斯的電影與演劇藝術，常使我感到特別深長的趣味。蘇維埃電影藝術，現在已震驚全世界了。可惜俄國電影的代表作品，因受神經過敏的各國當局的取締，我沒有機會見到，但就我在巴黎所看過的一張沙發和一

雙床，亞細亞的風潮，土西鐵路，在柏林所看過的大地，雖都是些不重要的作品，却都充分表現出眞實的情緒與特創的風格，和充滿着卑陋趣味的好萊塢作品相比，眞要算是電影藝術中的一大革命了。至於蘇聯的演劇，我在巴黎見過的莫斯科藝術舞台演劇團所演伐丹戈甫(Vakhtangov)的都蘭多公主(Princess Turandot)，梅友荷爾德(Mayerhold)劇團所演巡查官（即由 Gogol 的名劇 Revizor 改作的）莫斯科猶太劇團所演二十萬。（二十萬和都蘭多公主兩劇我在東方雜誌二十五卷十五號裏曾經介紹過。）這幾次的觀劇，都使我感到十二分的興奮和悅意。可惜在西歐，看俄國戲的機會太少了。所以我這次僥倖得在莫斯科住幾天，很想再有機會去看幾次新俄的演劇。

但是不幸的很，一個外國旅客，要在莫斯科觀劇，並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因為莫斯科的戲院全是國立，或者是由國家補助的。演劇的目的，並不是為贏利，而是為宣傳與

教育。所以觀衆幾乎全體是勞動者。戲票是在各工廠和職業工會裏分派的。據說工人看戲的機會很多，而購買戲票也很便宜。至於外國旅客只有在幾個大戲院裡，方買得到戲票，而且須出很貴的票價。我到莫斯科的第三天，曾託 V.O.K.S. 代買戲票，第二天 V.O.K。S. 回覆我，說是因爲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開會，一星期內全莫斯科戲院出售的座位全被大會代表包去了。如要買到戲票，至早須在十天以後。我不能在莫斯科留的這麽久，因此對於演劇幾乎絕望了。

但到了第五天U同志來報告我，說莫斯科大戲院還有二三個空座，但售價非常貴，每人要十二盧布，合中國錢就要二十四元。我雖旅囊不充裕，也頗想去一試，因這機會是不多得的。但U同志却再三阻止，說不犯着花了這麽多的錢去買票。他可以設法免票去觀劇。他爲這事整整去奔走了兩天。因爲他有紅軍軍官與普羅作家這兩重資格，到處可以通融。可是去戲院交涉幾次，仍被拒絕。後來他跑到人民委員會的祕書長

那裡去要了信來，方纔弄到三張免票。當他告訴我們成功的消息時，我們都不勝狂喜。因爲他所要求的免票，是莫斯科大戲院的座位，那時正演着哄動一時的跳舞劇紅花，而且這劇的情節，又是取材於中國的。

莫斯科戲院都是在晚上七點左右開演，到九點餘便散了。在七點以前我們到戲院廣場裡，前面便是莫斯科大戲院，這是莫斯科最大的劇場，可比之於巴黎的歌劇場(Opera)。建築很大，除樓下大廳以外，中央及兩旁的廂樓共有七層，全場大約有三千個座位，是完全擠滿的。我們雖然不花一個錢，却坐了全場最優的座位。原來是廂樓正中的一間，在革命前是俄皇和皇后的御座。這御樓正對舞台，而且直通屋頂，只有一層。在從前，這一間裡放着兩個寶座，在皇帝和皇后不來觀劇的時候，便閉鎖着，平常的觀客不能進去。現在是把寶座除去，按放了十餘個座位。無論怎樣卑微的勞動者也可以進這御樓觀劇了。我們也徼倖佔了這御樓的座位。這御樓中，地氈、門簾都非常講究。在

廂樓後面是休息室，有着列代名伶名文學家的雕像，和許多古畫。坐椅全是用很厚的絨墊，樓梯和走道全用大理石鋪成。這樣華貴的地方，現在只有勞動者有權利享用了。

據說平常在大戲院演的都是歌舞劇，我們去看的那天是演着 Ballet，Ballet 是一種只有音樂動作而無唱白的跳舞劇。俄國的跳舞默劇本來是世界有名的，現在更導入革命後新派藝術的成果，結構、跳舞、佈景、音樂，就無論那一方面而論都有了澈底的改革。

紅花還是初次上演的劇本，據說已有很大的成功，蘇聯的文藝界頗加以重視。這跳舞劇完全取材於中國，用中國背景，中國音樂表現現代中國生活與反帝國主義的鬬爭。全劇不過四幕：第一幕的佈景是上海黃浦灘上的一個輪船碼頭。一隻蘇聯商船正停舶着，苦力們在起卸貨物。碼頭上有許多外國水兵（也許是英美水兵）一面拿着鞭笞打苦力，一面戲弄碼頭旁經過的婦女。後來來了一乘花轎抬着一個漂亮的新

娘子。水兵把花轎攔住，搶去新娘子，叫她在碼頭旁的「酒排間」內陪着水兵跳舞。這新娘也居然從命，殷勤向水兵侑酒。碼頭上許多黃臉苦力看的不平，立時暴動起來，把碼頭上水兵一個個打倒，再進酒排間，去打那不要臉的新娘。於是酒排間內大批外國水兵出來和叛亂的苦力，互相廝打。正在危急中，船上戴着紅星帽章的水手數十人，趕到岸上，幫助中國苦力，把英美水兵一齊趕跑。第二幕是新娘的父親——一個就地紳士的客廳，這狡猾的紳士（大概是買辦一類的人）把蘇聯船主迎到家裏，謝他們營救之恩。第三幕是紳士家後花園的夜宴。原來紳士串通英美水兵，想用藥酒毒死蘇聯船主及水手。幸紳士宅中的傭工暗中通知客人，客人拒絕飲酒。主人見事敗，乃做一手勢，園中樹枝上埋伏的英美水兵巡捕一齊出來，把蘇聯水手團團圍住。同時宅內傭工及苦力則加入水手方面，和「帝國主義」戰鬬。第四幕極短，工人得了最後勝利，開幕時全場黑暗，漸漸放出一線紅光，東方天空上一顆紅星出現，場中隱約看見一面紅旗。漸漸光

明，最後在滿場紅光中，幕徐徐落下。

就劇情而論，彷彿只是淺薄平凡的宣傳劇而已。但實際並不如此，劇中處處用象徵的暗示的方法，表出生命活動的力量。從開演到閉幕，全用跳舞和佈景來表現在平常教訓劇，寫實主義劇中所用的寫實的方法，全然找不出來。反之觀了紅花，正如看梅德林克、羅斯坦一派的象徵劇，把人引入幻想的世界裏。不過在這裏象徵的用法，却更有氣魄、更有活力，決不是帶着頹廢氣分的新浪漫派戲劇可比。

新俄的演劇藝術裏，佈景佔極重要的位置。像我所見過的伐丹戈甫與梅友荷爾德的戲劇，佈景的方法，都打破向來的傳統，而別樹一幟。不過跳舞劇的佈景又和這些不同。紅花一劇佈景，可謂窮極奢華。連我在巴黎 Music Hall 所見過的佈景，也遠不及此。這戲是用中國材料，所以佈景也全然是中國的。劇中人物的服飾大部分是模倣中國舊戲中的服裝。劇中客廳花園的佈景，華麗到了極點。舉一個例，如描寫花園的富

麗，則用池中游魚來烘托。其中有一景是用電影來幫忙，把滿池的五色魚映在幕上，自由自在地游泳着。像這樣不惜工本的佈景——自然這只有在大劇場纔有，在蘇聯特別發展的小劇場，決不會有的——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音樂也很奇特。因爲所用的全是中國調子，配入西洋曲譜，用西洋樂器演奏。其中最常奏的是「梅花三弄」的調子。這是成功和失敗，我不懂音樂，不敢斷定，但我只覺這一類的音樂和台上的佈景和動作，非常調和。

蘇聯的戲劇的理論家，以爲西方的戲劇，由宗教演劇一變而爲宮廷劇，再變而爲專供有閑階級賞玩的心理表現劇，完全失掉了戲劇的社會的意義。唯有東方的戲劇尙未脫民間藝術的意味，和大衆文藝隔離的不遠，所以主張儘量採納日本古代劇和中國舊劇的佈景和表現方法到新劇裏去。紅花之用中國材料，而得到絕大的成功，或者也因了這個緣故。本來西洋演劇藝術，自新浪漫主義以後已漸漸走到末路。在歐戰

以後，倫敦、柏林、巴黎的劇場，除重演舊作品以外，比較偉大的新作品很少出現。在這時候，別樹一幟的新俄演劇藝術於未來戲劇界，一定會有極大的影響。

生活教育、勞動教育

我到莫斯科以後，本來就注目在文化工作，而於著名全世界的蘇俄新教育，更打算詳細參觀一回。但因爲在莫斯科的時間太少，而可看的東西實在太多。所以直延到最後一天，方纔匆匆地去參觀了一所模範小學校。其實參觀新式教育，不要說一天不夠，便是費了整禮拜的工夫去視察，也只能看個外表。不會有從容的時間去參觀學校，也是這次旅行中的一件恨事。

在蘇維埃國家裏，所謂「學校」這個名辭的概念，就和別的國家不同。如果我們對

於學校，仍帶着一般人所具有的概念，這樣對於蘇聯教育制度，不會有正確的理解。因爲在一切國家內學校都被看作一種超社會的特殊的組織。高級學校，是專備造就社會的特殊階級的，也只有特殊階級的兒女，方能進去。至於初級學校則爲了造就有效能的勞動奴隸用的。所以學校完全失却了社會性。至於蘇聯的教育原則，則明白規定着，學校是階級的，就是爲提高階級文化而設的；學校並不是一種獨立組織，却是和生活與勞動，三者結合爲一體。總之學校乃是社會的。

在別的國家內，學校是專爲教育未成年人與青年人而設。因爲學校和生活根本不發生關係，所以從學校裏得到了資格學得一些專門的技術，一旦走出校門，以後便不再和學校發生關係了。在蘇聯則不然。在社會主義國家內，承認教育和生活及勞動密切不可分離。人類生存一天，便須勞動，便須教育。所以在別國學校生活只佔人生的一個極其短促的部分，而在蘇聯則以爲學校生活應延長到終身。

因爲生活、勞動、教育三件事不能分離，所以社會、工廠（或農場）學校，這名稱不同的三件東西在實際上也竟看作是同一件東西。在工廠內教育，在學校內勞動，而社會生活也不外教育與勞動。

就蘇維埃的教育制度中，基本教育的組織，表面上和別國差的不多。兒童從四歲到八歲進幼稚園或「兒童市」。八歲到十五歲進初級學校。十五歲以上進職業學校、高等學校以至大學校。但基本教育不過佔了整個教育制度中的一小部分。除基本教育以外，還有各種的補充教育。補充教育之以提高成年人一般文化爲目的的，有工人大學、大學夜班、成年人中學等；以職業訓練爲目的的，有工廠藝徒學校、工人技術夜校、農場管理傳習所、機關人員傳習所、高等學校預備班等；以灌輸大衆政治智識爲目的的，有工人俱樂部、農村俱樂部、圖書館、博物館、戲院、報紙、旅行、講演會、無線電播音、電影等；以共產主義教育爲目的的，有共產黨大學日夜班、黨初中級夜校、黨初中級蘇維埃

學校、黨內文化訓練部等。此外又有普遍全國的成年人識字學校、工人初級夜校、以及識字運動等。這樣使工人、農民在無論何地，無論何時，都有受教育的機會。而教育的綱領，則又不外以適應社會主義的新生活爲原則。

蘇聯施用强迫義務教育，還不過是較近的事實。因爲在革命後的幾年，因教育經費與敎師的缺乏，普遍的義務教育事實上不能做到。直到去年（一九三〇年）八月政府纔下令實施全國普及義務敎育。規定以八歲到十五歲的初級學校，爲義務敎育的期限。在革命以前，俄國識字人數，不過估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三，但到了一九三〇年，增至百分之六二・六。到五年計畫的末年，義務敎育推行全國，不識字的人數將減至於零。

但這並不只是發一道命令，定一個計畫，就算完事。在一九三〇年，政府新設學校，達四萬五千所，學童增加一千四百萬人，需要新敎師五萬人。在一九三〇——三一年，

全國平民教育經費約增一倍，卽從六萬一千五百萬盧布，增至十萬零一千萬盧布。初級學校雖大多不收學費，但農村貧苦兒童仍無力入學校；政府特撥出大宗基金，專備補助貧家兒童購買衣履、書本及午餐之用。政府另支出經費購靴一百萬對，贈給農村學童。可見政府推行義務教育，是煞費苦心了。

自從五年計畫實施以後，學制也經過一次革新；以前蘇聯學制，和德法學制相類似，普通教育定爲十年：初級學校七年，中級學校三年。現在則實行「學校的工藝化」把三年的中級學校裁撤，另外廣設職業學校、工廠學校，以代替中等教育。初級學校，則於校內一律附設工廠、工場或田莊，使兒童於修業時，一面卽開始生產的勞動。這樣便把教育和勞動完全合爲一體。但這「學校的工藝化」和一般所謂「職業教育」卻又完全不同。因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職業教育，是只使兒童學習工作技能，訓練成能產出贏利的勞動奴隸，並不注意於兒童的社會的教育。蘇聯的新教育制度卻不然，使兒

童從事勞動不過是養成勞動的習慣，此外對於兒童個性的發展、智力的提高、自然與社會智識的增進，仍同時顧到。這種教育方法的優點，是使學校不至和實際生活隔離，從學校出身的不至變成不事生產的特殊階級。在這一點，我想現代無論那一國的教育都不能辦到的。

一個小學校

我去參觀的那個學校，是莫斯科市內模範小學之一。在那裏一切設備和教學法，全是新式的。校舍由前貴族邸第改建，很寬大而不十分富麗。校外校內，樹木園庭很多，現在是全被白雪掩沒着，不然，在春季裏風景一定是十分秀麗的。

所謂小學教育，可以說就是蘇聯的完全教育。我在上面已說過，初級教育從八歲

起到十五歲，共是七年。但是八歲級的學童，大概已在幼稚園及其他幼稚教育機關裏，受過四五年（四歲到八歲）的教育，已有我國現學制國民學校畢業的程度。對於語文與數學已有了相當的智識。至於高年級的學童，則差不多已達到了智識的成年。有的在十三歲十四歲級已進工廠去作半天工；餘下半天仍在學校讀書。新學制雖然規定着初級學校和高等學校、職業學校或大學校銜接，但事實上據說初級學校修完後，立卽升學的很少，大多數的學童修完小學教育後，都願意進工廠勞動，做了幾年的工作，有了相當的勞動經驗後，再升入高等學校或大學校。因爲在蘇聯，高等學校、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並不給你社會上特殊地位的保障。所以一般學生並不以升學畢業爲榮；反之，對於勞動的興味，則十分濃厚。

學校內的分級，完全以年齡爲標準。例如未到八歲的爲八歲級，未到九歲的爲九歲級。

歲級到十四歲級修完了，就算是畢業，因爲在蘇聯小學校考試是早已廢除了的。

不但考試沒有，卽平時的工作，也完全是自由的，一切都由學生自由選擇。科目和各國普通學校差不多，有俄文、外國語（英德文）數學、社會科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等。教學法非常特別。每一種科目都有一個或數個課堂。文學語言與社會科學課堂放着許多參考書籍和圖表；生物學、物理、化學課堂放着許多儀器標本。每一課堂內有一位教師擔任指導。學生不限年級，亦不限時間，隨時可進課堂內工作，由教師指導。（我走進德語課堂，見許多學生讀着德文原著的共產主義者宣言）這種教學法，據說是根據道爾頓制而加以改良的。

課堂以外，更有許多小房間，是學生修業室，學生可隨時進去自修。我問着一個女教師，既沒有考試，也沒有畢業，不知道用什麽方法考驗學生成績？學生是否有貪懶荒棄課業的情形？據她的回答，用這種新方法，比向來用考試制度，强迫聽課制度，學生的成績要好的多，因爲研究是讓兒童自由的，大多數的兒童都很勤奮，對於各門功課，都

有豐富的興味。又學校雖沒有考試，而學生自己則用社會主義競爭的方法，互有砥礪。這競爭方法是由各級間，或同一級間，或各個人間互相訂結契約，限期修完某項功課，到期後舉行成績比賽，由教員評定優劣，成績最優的，由學生團體給以嘉獎，如成績不良，則加以名譽的懲罰。例如九歲級的全班學生，與十歲級的全班學生，訂約於一年內修完各該級的學科標準；又如同屬一級內的學生甲乙丙丁四人共同訂約，在一個月內做完代數練習題兩百個。全校學生幾乎全體都加入競賽，有許多學生同時加入數種競賽。但一切競賽全是由學生自動發起，由學生自動加入，教師不加干涉。這種自動的競賽方法，比考試制度更容易促進學生的勤奮。因爲前者不過是用學校的資格去強迫學生讀書，而後者則以社會的榮譽去推進學生工作。少年人，尤其是蘇聯的少年人，對於社會的榮譽，自然比對於徒存形式的資格看的重了。

只有一種科目是強迫的，便是體育。在俄國學校錦標式的個人的競賽並不流行，

但對於兒童身體的鍛鍊卻非常重視。每天早晨八點，學生進校時有二十分鐘的早操；全體學生必須加入；每天又有三四次的五分鐘徒手操，全體學生必須加入。規定徒手操，是因為恐怕兒童整日不斷的工作，於身體腦力有妨害，所以每隔二三點鐘，必須作一回徒手操，學生被強迫加入，不像旁的功課，可以由學生自由選擇。

上面說過，依近年新定學制，初級學校都附設工廠農場。這附設工廠農場的意思，並不是要把一切學校，化為職業學校，因為工場與教學全然是兩個部分，教學方面是使學生增進一般常識，而工場方面則使學生養成勞動習慣。學生在課堂內的修業，與工廠的勞動全無關係。因此即使準備做體力勞動者的，在普通學校內亦必須學習一些文理藝術及生活常識；反之專志學文理純粹科學的，亦使其從幼年起有勞動的訓練。

每個學校內的工場，都有一個特殊的職業傾向，例如我所看的那個學校，附設着

的是製造飛機的工場、有金工室、木工室，所製造的全是飛行機的機件。八九歲的兒童即開始練習用紙板製造飛機雛型。年紀大一點的先練習木工，後練習金工。木工室金工室的佈置和工作情形，全然和平常飛機製造廠一樣，只是另有教師在指導着工作。這樣，學生有了七年的勞動經驗，待脫離學校時，已成了一個熟練工人而且一個完備着一切生活常識的工人了。

工場與課堂是同時開放着，兒童何時進工場勞動，何時進課堂修業，亦全然由兒童自己選擇，學校不加限制。據一般的經驗，大多數學童都把每天大部分的時間，用在工場作工，只把小部分的時間，在課堂修業。因爲少年人往往愛好勞動甚於乾枯的書本。

學生的課外集團生活非常發達。我去看的那個學校，每天在下午六點以後，必有學生的講演集會。每五天爲一週，第一天是體育會，第二天是技術或政治講演會，第三

天是音樂會，第四天是軍事訓練班或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集會，第五天是文化工作的集會，如自由思想同盟的集會或旅行等。校內放着耕田汽車兩輛，平時學生在學習開駛方法，一到春間播種期，或秋間收割期，學生帶着耕田汽車，到鄉村去幫助農民耕種收穫。在每年暑假，學生大多被送往鄉村兒童殖民地去避暑。這樣，雖然是在城市中生長的兒童，對於農村生活仍不至十分隔膜。

學校內有大廚房，規模雖沒有像阿摩工廠的廚房那樣大，但非常清潔，注重衛生設備。全校學生都在校內喫飯，每天五頓，有三頓是正飯，兩頓是茶點，並有牛乳。喫飯時與工廠情形相同，須先買票，但價目比工廠食品更低廉，貧窮學生則不收費。蘇聯初級學校概不收學費，貧苦勞動者的子女兼免膳費書籍費，有時由學校供給衣服鞋帽。

這樣可以推想兒童們一天到晚在學校中生活。早晨八點就到校，早操，早操後在校內食堂早飯。以後整日便在校中修業、做工、游戲、進膳。晚上六點後加入各種公共集

會。到九點鐘在校內進了晚餐，方才回家跟着父母睡覺。學校便是整個的兒童社會，社會便是兒童的學校！

這所學校中還附設一個孤兒留養院。留養的孤兒除和其餘兒童共同修業作工外，晚間亦留在校內。有寄宿舍，設備頗淸潔整齊。但留養人數却不多。據說這孤兒院是爲撫養因革命而殉身者的子女而設的，數年前留養人數甚多，但現在大多已長大，能獨立勞動，留下的已不過二三十人，不久這孤兒院也要裁撤了。

國家銀行

在離莫斯科以前，因爲要兌換一些錢，又匆匆地去國家銀行走了一遭。這國家銀行是專理國外匯兌事務的。國外匯兌完全由蘇維埃國家銀行操縱。蘇聯貨幣因資本

主義各國的一致拒絕兌換，所以沒有國際匯兌市價。在事實上，盧布及「采馮尼茲」（每個值十盧布）只是在蘇聯境內使用的貨幣單位，而在國際貿易則又以美金爲單位。蘇聯輸出物品所收入的美金匯票由蘇聯國家銀行存儲，而以此償付一切輸入物品的貨款。所以蘇聯的國際貿易，輸出入必須絕對維持均衡。近年因採行五年計劃的結果，購入大量的機器、農具及工業原料，輸入驟增，因此亦不得不儘量擴張輸出貿易以相抵償。在蘇聯境外所聽到的「蘇維埃探併政策」「布爾希維克破壞經濟陰謀」這一類聳人聽聞的推測，便由此而起。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經濟制度還只好採取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貨幣和工錢制度既不能廢除，所以利潤也還是存在着，不過國家隨時可加以制限，不使個人利潤特殊膨脹。只有國家銀行有權收受儲蓄存款。儲蓄事業在近年非常發達，因爲一般工資增加，失業消滅，而消耗品則購買均有限制，所以勞動者都可有餘款去儲蓄，

國家則利用人民儲蓄作工農業的主要資本。R女同志很感慨地說：『數年前國家銀行的存款利息是一分甚至一分二厘，現在已減到六厘，可見我們的政府現在已順利的多，需款不像從前的迫切了』。

R女同志更拿出一種公債票給我看。蘇聯政府公債發行及付還本利的手續，單純而便利。債票全是不記名的，每張只有像普通明信片那樣的大小。正面印花紋及數額，有五盧布、十盧布及十盧布以上的。這些公債的還本期大概都很短，在半年一年後卽開始付還本息。本息還款的數目，便開列在債票後面，製成一個簡明的表。例如一九二五年一月發行的十盧布債票，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開始還本，共本利合計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是十一盧布二十戈貝克，一九二六年二月是十一盧布三十戈貝克，這樣積累下去直到第四五年而止，時間越久，本利數目越大，但無論何時其本利總數，只須在表上一索卽得。這公債票一到還本開始期，可隨時向國家銀行兌現，並在一切國營商

店、國營機關，可當作現金通用，其性質幾和紙幣相等。但紙幣如藏着不用，不能增加利息，而此項債票則利息每月增加。所以購債票的往往到了時期仍不去兌換。就這一點，也可以證明現政府信用的穩固。

兩世界

"Gis la revido! Bonan vojaĝon! Vivu la Revolucio!……"

二月三日薄暮，趕到了城南車站，上了火車，不到兩分鐘，在熱烈的歡呼聲中，車便開行了。我還來不及和送別的朋友們一一握手，這樣便匆匆地離開了普羅列太里亞的首都！

在橫斷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列車中，終日只看見車窗外白雪紛飛，居屋、牲畜、家

宅、田莊全被埋在冰雪中，整個世界披上了縞素。每隔半天或一天，列車停在一個大車站，才看得見人類的活動。在荒涼的烏拉山頂史韋爾特洛甫斯克(Sverdlovsk)可望見離車站不遠新建的大城市。電車和公共汽車往來不絕。工人住宅的摩天建築矗立在車站後方。據說這裏的鑄鐵廠，雇工十萬人，已是歐洲最大的，數年後將擴充成為世界最大的鑄鐵廠。經過奧木斯克(Omsk)伊爾庫次克(Irkutsk)一帶，到處可以看見新建的伐木工廠和集產農場的經理處。這自從原始時代以來，埋沒在冰雪中，在從前只見鮮卑游牧部落，在近代專供流放政治囚犯的世界最大荒原，現在眼見得要被電氣化和機械化所征服了！我們怎能不驚嘆人類生活力的偉大呢！

因爲大雪嚴寒，連機關車輪都給凍住了，本來從莫斯科七天可到滿洲里的，直到第八天午後方到。到了滿洲里後，便換坐了赴哈爾濱的中東路快車，開車已經是黃昏時候。一羣饑餓倦怠的長途旅客，都擁入了餐車。中東路餐車的大菜，烹調十分的講究。

喫完了以後，我們坐着傾聽鄰座旅客們的談話。

這餐車中不過十餘個客人，因為八天來同在西伯利亞車中，有一大半，我都已認識了。其中有一個是在巴黎住過很久的波蘭小商人，到上海去謀事的。另一個是南京大學以重金聘去擔任田徑賽教授的德國少年。這兩人都生得瘦小機警，因為是第一次到東方，所以愛見人問中國生活情形。此外是一對四十餘歲的德國人夫婦，帶着一個小孩。男子是上海美最時洋行「大班」。這「大班」夫婦雖然不是體育專家，可是都生得肥胖結實，比我們那位田徑賽教授要肥大到三倍。在西伯利亞車中每次我經過頭等車的休息室，見着這一對胖夫婦並肩坐着，我總要替那隻沙發叫屈。另有一對較年青的夫婦，是奧國人，也在上海做事，我不知道他們做些什麼。

他們六個人圍在一隻餐桌談話，小孩則坐在桌角拿刀叉玩着。因為除了我們那位「武學教授」以外，其餘五個人都是去上海的，所以他們的談話的中心是關於上海

的生活談話全用着英語雖然他們的英語全是怪腔不成調的

『×先生，今晚你該飽嚼一頓了。在西伯利亞車中每次開飯你總是叫苦不能下嚥的。』奧國太太向着波蘭商人說。

『是啊，幸虧我們帶了許多啤酒、餅干、一大捆上等的臘腸，要不然，我的丈夫早就餓死在西伯利亞冰窖中了。』是胖太太粗糙的聲音。

『共產黨要錢眞是兇，西伯利亞車上這樣壞的菜，卻要四個馬克呢。在上海花了這些錢，我們可以喫兩頓上等菜，而且連惠斯克酒都在內呢。』

『對啦。上海眞是便宜。那次我叫「僕歐」拿兩元錢，去買來一隻大母雞。上海兩元，你想，只三個馬克。現在銀價跌了，才只一個半馬克呢。』

『這還不算啊。我那次自己到小菜場去，一元錢就買了一隻活鷄。』

『上海的「僕歐」才更便宜啊。我們家雇的男工，每月只拿十五元工錢，才只十

二個馬克一個月!……又勤力,又忠心。中國人都是這樣忠心的』又是「大班」娘娘的聲音。

『有這樣的事嗎?我在俄國車站,叫脚夫提了三個小皮夾,就花掉六個馬克呢。想不到上海是這樣便宜的。』於是C大學的教授發言了。

"It's very, very, very cheap, so cheap ……"

『嘩啦啦!……』

正說的高興,坐在桌角的孩子,把桌上盆子打落在地上了。我被這聲音驚醒,纔恍然覺悟,我是已從一個世界,旅行到別一個世界了。

回想在莫斯科七天的生活,和在那裏所看見所接觸的風景人物,恰如隔夜的夢痕,已無從追尋。